

目 录

特载

在 2012 年《西安年鉴》工作会暨“年鉴进万家活动”启动仪式上的讲话 段先念(3)

我们的村落

在水一方的才俊故里——瓜洲村 卢知民(5)

依山傍水的水磨村 秦 羊(9)

历代名人与西安

杨虎城在西安建止园 (12)

学术交流

正确处理地方志事业科学发展的几个关系(下)
..... 李秋洪(13)

人物春秋

西安人民的好市长——方仲如 (16)

史料钩沉

“雷锋精神”50 年演进史 (19)

古代中国的“两会”和“提案” (23)

历史上草船借箭的主角是孙权而不是诸葛亮
..... (25)

孔子真的只“知礼”而“无勇”吗 (26)

戊戌第七君子何以脱难 (30)

西安风情

大唐西市 (31)

西安小雁塔史话 宋亚颖(32)

隋唐长安城门趣闻(十)——延兴门 (33)

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

阎良新兴特技喷呐 富小云整理(35)

文史拾趣

清明节的由来与传说 (36)



西安地方志

2012·第 2 期

(总第 215 期)

陕新出连内印字第 00016 号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美食达人”陆游	(38)
清代落第举人的另一出路——大挑	(40)
周恩来“咬文嚼字”二三事	(43)
隋炀帝的“节会”政治	(45)

志鉴动态

我市举办西安年鉴工作会暨年鉴进万家活动 启动仪式	(47)
第二轮西安市志编纂工作业务培训会召开	(48)
《西安市志·人物志(1991-2010)》资料搜集 工作研讨会召开	(49)
《碑林区志(1994—2008)》通过终审	(50)

知识窗

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来历	(46)
被误传了几千年的俚语	(51)
东汉时买个官来当花多少钱	(52)
为什么古人把路费叫做盘缠	(52)
在中国任职时间最长的外国人	(53)
“买春”原本是买酒	(53)
古代“宅女”超龄不嫁会被罚款	(54)
什么是丛书	(54)
“万岁”的来历	(55)
何谓“六经皆史”	(55)

历代诗人咏长安

城东早春	(唐)杨巨源(56)
------------	------------

解字

“仆”	(11)
“仁”	(18)

名句欣赏

【树德莫如滋,去疾莫如尽】等五句	(37)
------------------------	------

《西安地方志》编辑委员会

主任:冯艳阳

副主任:姚敏杰 任昆明 张 帆

王 莹

委员:崔义萍 杨军亚 彭栋为

高长安 姚文东 崔桂琴

富小云 张 耀 高 鹏

《西安地方志》编辑部

主 编:姚敏杰

副 主 编:高长安

责任编辑:宋亚颖 王文竹

主办: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

编辑:《西安地方志》编辑部

地址:西安市凤城八路 109 号市政府

大院 26 号信箱

邮编:710007

西安地情网:www.xadqw.cn

西安市地情资料信息中心基础数据库

<http://125.76.215.234:8080/difangzhi/>

E-mail:changannan6861@sohu.com

电话:029-86788731

在 2012 年《西安年鉴》工作会暨“年鉴进万家活动”启动仪式上的讲话

西安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段先念
(根据 2012 年 2 月 28 日讲话录音整理)

同志们:

大家好!很高兴参加今天的这个会议。我们地方志办有一个团结进取的班子,有一支干事创业的队伍,有一股务实创新的风气。特别是这两年,市方志办的面貌发生了很大改变,可以说硕果累累,精彩纷呈。编纂的《西安府志》、《唐代长安词典》、《世园在西安》、《西安六十年图志》、《为西安喝彩》,每一部书都非常精彩,社会反响也很好。我市的年鉴工作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连续几届获得全国特等奖,这是比较少见的。今年我们围绕贯彻落实市十二次党代会“文化进万家活动”精神,又启动了“年鉴进万家”活动,这项活动的启动对丰富群众文化生活,让全市人民充分享受文化发展成果,意义十分重大,搞得非常好。这些新思路、新举措,使我们的工作往往先人一步、高人一筹。这是一种精神状态,也是一种历史担当。

下面,我再补充几点,供大家参考。

一、要充分认识做好年鉴工作的重要意义

地方年鉴作为地情信息的一种载体,是权威性资料著述,其外延宽泛、内涵丰富,涵盖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为一体。因此,年鉴编纂工作具有很强的

政治性、历史性和现实性,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方志事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启智后世的千秋大业。由于年鉴是一个地区或部门最新的综合信息载体,能够及时地提供全面、系统、准确的综合信息,对广大干部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进行科学决策具有不可忽视的资政价值,并在积累先进文化成果,传播科学文化知识和信息,提高干部群众科学文化素质,开阔视野、启发思维、引导社会舆论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年鉴也是我们认识和了解一方水土的窗口,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地方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变化发展的概况。当前,我们正在加快建设国际化大都市,要把西安建设成为展示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窗口和彰显华夏文明的重要基地,这是一种历史担当和文化气魄。我们方志系统的同志,也要有这种担当和气魄,以我们独特的方式为记录西安阔步前进的脚印,展示西安精彩靓丽的片段做出自己的贡献。

二、要努力编纂展示西安历史文化名城独特魅力的精品年鉴

我市文化蕴含丰厚,具备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先天优势。年前的第十二次党代

村落是社会的基本组成部分,向上追溯,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祖先生活过的村落。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一个个城中村改造项目或其他项目的实施,加之村落自身的开发等,村落在巨变,部分村落在消失。

为落实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为西安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服务。经市政府同意,由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负责征集西安村落资料,《西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西安村落记忆〉资料征集工作的通知》(市政办发[2012]18号)已经下发。我们拟在资料征集工作完成后,编纂出版《西安村落记忆》(上、中、下),同时在“西安地情网”上开设相关专栏,留存西安村落资料,宣传西安村落。

本刊开设“我们的村落”栏目,目的就在于,配合该项工作的开展,讲述西安各个村落的发展轨迹,唤起记忆,畅想未来。

在水一方的才俊故里

——瓜洲村

◎ 卢知民

在西安市长安区东南方向的神禾原,有一座历史悠久的人文村庄,它就是韦曲街道瓜洲村。这里山清水秀,满目佳景,英才辈出,古今闻名。全村由南北相邻的瓜洲村和瓜洲堡两个自然村组成,村委会下设4个村民小组,共有275户,1086人。耕地面积980亩,村中包容郑、杨、高、马、王、陈、潘、包等10余个姓氏人家,他们世代和谐相处,共同建设自己的美好家园。

瓜洲村建于唐代以前。这里是晚唐大诗人杜牧的出生地,于是便有人说,瓜洲村是因杜牧在此种瓜而得名。其实,杜牧的祖父,唐朝中期著名的政治家、史学家杜佑已居瓜洲村。晚唐诗人许浑写有一首题为《和淮南相公

与宾僚同游瓜洲村别业》的七律诗,淮南相公就是杜佑。说明在杜佑前,已有瓜洲村之地名。宋人张礼通过对该村南原上瓜洲墓的考证,也否定了杜牧种瓜而得村名之说,做出了“岂始有瓜洲人居此而名之耶”的结论。然而不管怎样,瓜洲村都是一个古今闻名的人文村庄。它不但是杜佑、杜牧的故里,近代,这里还诞生了一位后来蜚声文坛的著名作家郑伯奇。下面,就让我们逐一领略这些文坛巨匠的独特风范。

杜佑(735~812年),字居卿,出身于晋、唐时期长安望族,曾祖、祖父和父亲均为显官,政绩卓然。杜佑7岁读书,好学经史。18岁直接补任济南参军,以精明吏治,长于治事而为



人所称道。后又相继任县丞、工部侍中、水陆转运使、金使、淮南节度使，兼徐、泗、濠诸州节度使等职。贞元末，擢升为检校司徒同平章事。王叔文进行改革时，刘禹锡推荐他任度支盐铁使，他认为“钱谷者，国之大本”，于是毫不推托，欣然接受。他还继续推行改革政策，大刀阔斧地精简度支司机构、人员，明确各司职务范围，杜绝了宦官干政。这些做法，深受当时舆论的推崇和赞美。在军事上，面对吐蕃、常希的边境寻衅，他坚决反对对外用兵，主张在费用不足的情况下，采取“来则惩御，去则谨备”的防守政策。既制止了边将邀功的心理，又减轻了老百姓的赋役负担。杜佑不仅以杰出的政治才能见著于当世，他还善于总结历代的典章制度以服务于现实政治，给后人留下了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他虽然身居高位，临朝摄政，异常繁忙，但仍十分勤奋。在公事之余，常常秉烛达旦，研究史典，著述不辍。历时 35 年，完成了他一生费时最久、成就最大、享誉最高的《通典》一书的编著工作。在

此之前，已有刘秩撰成《政典》35 卷，按《周礼》六官所职分门编撰。杜佑得到此书后，认为条目未尽，于是广其所缺，参益新礼，于德宗贞元十七年(801 年)撰成《通典》20 卷。全书共分 9 门：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及边防。他特别重视财政经济，故将“食货”门列于全书之首。过去也有关于典章制度的记载，均是附载于正史之“书”“志”，未有专书。《通

典》则发展以往的“书”“志”而创典志体，且系纵贯古今之通史，在中国史上创建了新的史书体例，为后代政书的撰述开了先河。杜佑曾在瓜洲村建有当时城南最为著名的别业。

作为一名政治家，杜佑做出了杰出贡献，作为史学家，他亦有卓越的建树。尤其令人赞叹的是，他的子孙也大多是栋梁之材。而最为人们瞩目的，当数他的孙子，晚唐著名的文学家杜牧了。

杜牧(803~853 年)字牧之，因晚年居住在长安城南的樊川胜地，故又别名樊川。他的父亲杜从郁曾任太司议郎、秘书丞、终驾部员外郎等职，祖父杜佑更是唐德宗、顺宗、宪宗 3 朝宰相，因此，他对自己的家庭始终引为自豪。杜牧的童年，生活富裕而快乐，祖父、父亲相继去世后，家庭日益贫困。但他自幼“好读书，工诗为文”。26 岁时，他以第 6 名的成绩考中进士。有人曾称赞他：“此人真王佑之才也”！同年，考中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授弘文馆校

书郎、试左武卫兵曹参军。后不久就到江西、淮南等节度使府邸去做幕僚，这就使自恃有经纬之略，想在政治上有一番作为的杜牧感到很不得志。杜牧所处的晚唐时期，存在着严重的内忧外患，社会矛盾尖锐激烈。他怀着安邦济世的抱负，研究“治乱兴亡之迹，财赋甲兵之事”，提出了不少政治主张。他反对分裂，主张削藩，加强中央集权，反对外族侵略，主张收复失地，巩固国防。他熟读经史，研究兵法，写了不少军事论著，还注解修订了曹操所释的《孙子兵法》13篇，流传后代，为用兵者所推崇。杜牧的文学思想，同他的政治思想是基本一致的。他在《答庄充书》中，对文学作品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作了很形象的阐述，主张“凡为文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辞采章句为兵卫”，强调文以致用，形式为内容服务，反对片面追求华丽词藻的形式主义倾向。他的诗作，内容丰富，反映面颇广。就其内容题材而言，大致可分为3类。一是关心世事，爱国，忧民。如《题村舍》诗写道：“三树稚桑春未到，扶床乳女午啼饥。潜销暗铄归何处？万指侯家自不如。”直接描述了人民的饥饿惨状，控诉了



贫富悬殊的社会黑暗；二是咏史怀古。如《题乌江亭》诗：“胜败兵家事不期，色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用项羽兵败乌江的历史事件，说明只要重人才，则可不计胜败；三是写景抒情，纪行咏物。写景诗如《长安秋望》诗云：“楼倚霜树外，镜天无一毫。南山与秋色，气势两相高。”寥寥20字，不仅画出了长安明净高朗的秋空，还映衬出南山的峻拔。他的纪行诗均写得有景有情，充满诗情画意。杜牧不仅是杰出的诗人，也是继韩愈、柳宗元之后的散文大家。他的政论文成就最高，充分显示了他卓越的才识抱负，也流露了他深切的忧国之情。他写的骈文辞赋也有不少的精彩篇章。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家喻户晓、脍炙人口的名篇《阿房宫赋》。其中“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等名句，一针见血地揭露了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对贪官污吏暴虐百姓予以无情鞭挞。由于杜牧具有极高的文学成就，在唐代诗人中，人们总将他与诗圣杜甫相提并论，将杜甫称为老杜，将杜牧称为小杜。在晚唐诗人中，杜牧和李商隐齐名，被人们合称为“小李杜”，以区别于李白与杜甫。杜牧诗风严谨，对自己要求很高，据说他一生共写了1000多首诗。晚年时，他将自己一生的作品进行了一次认真检查，对认为质量不高的诗稿全部焚毁，仅存400多篇，收入《樊川文集》，共20卷。另外，他在书法、绘画方面也颇有功底。杜牧虽然满腹经纶，却一直官居下位，颇不得志，心中常常闷闷不乐，后来在病中为自己写好墓志和祭文，50岁时死于长安安仁里，葬于今大兆

司马村东北的杜氏祖茔。

大概由于受杜佑、杜牧等古代文坛巨星的深刻影响，瓜洲村的人文传统才得以绵绵不断地传承。在现代，从这里也走出了不少文化才俊，其中最著名的，便是革命文学拓荒者之一郑伯奇。



郑伯奇，原名隆谋，曾用笔名何大白，郑君平等，1895年出生于瓜洲村。他在青年时代就满怀报国之志，曾参加同盟会和辛亥革命，1917年赴日本留学，并开始文学创作，1921年参加创造社。1926年回国，任中山大学教授，黄埔军校政治教官。1927年后，出任上海艺术大学教授、上海艺术剧社社长，并负责创造社在国内的事务，发表了具有反帝意识的独幕剧《抗争》。1930年，他与鲁迅、冯雪峰、夏衍等12人一起成立左翼作家联盟组织，被选为7

位常务委员之一。同时还参加了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反帝大同盟等组织，对促进革命文艺、培养青年作者做出了贡献。在左联活动期间，郑伯奇与鲁迅紧密配合，积极工作。1932年，他做了“良友”图书公司编辑，在4年期间，与鲁迅交谊最多，利用“良友”这个阵地，大量出版鲁迅等左翼作家作品，反击文化“围剿”。1938年，他回到西安，主编《救亡》周刊。1944年起，任陕西师范专科学校教授，并主编《每周文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郑伯奇任西北大学教授、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北文联副主席和全国文联委员，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委员、陕西省政协委员等职。1979年1月25日，这位在“五四”以后的新文学运动中，诚实、勤恳、脚踏实地的战士，在西安与世长辞，安葬于长安鲸鱼沟墓园。

欣逢盛世，英才辈出的人文村庄瓜洲村，也在不断发生喜人的变化。村内道路已经全部实施了水泥硬化，两委会阵地建设规范，村民娱乐场所设备齐全，卫生管理保持良好，村容村貌大为改观。村民在科学务农的同时，兼搞承包工程，短途运输，苗木栽培和外出打工等多种经营，经济收入不断增长，生活水平日益提升。瓜洲村的发展前景：新建的西部大学城已与本村连接，西边邻村的何家营鼓乐开发项目即将实施，村北的灞河公园建设工程也待启动，这些充满生机的外部人文环境，都与瓜洲村的人文传统相契合，为瓜洲村依托文化企业举办配套服务带来了极大商机。展望未来，在水一方的才俊故里瓜洲村，必将在浓厚的人文氛围中迅速崛起，展现新姿。（本文选自《长安百村》）



依山傍水的水磨村

◎ 秦 羊

水磨村位于长安区东大街办南 3 公里的终南山下,高冠河西岸,长安与户县交界。长安通往户县的环山公路从村西至北向南而过,原属祥峪乡管辖,现由东大街办管。村民有 64 户,245 口人,耕地 325 亩,主产小麦、玉米、水稻。

水磨村地势平坦,水资源丰富,数条如玉带的小溪从村边潺潺流过,池塘水波粼粼,倒映出终南秀姿。村四周果树百亩,葱葱郁郁,将村庄衬托得更加秀丽,犹如镶嵌在终南山下一块娇小玲珑的碧玉。

水磨村虽然是个庄户不多,人口较少的小村庄,但她的历史却很悠久,据《长安县地名志》载:“水磨村建于唐贞观年间。”《咸宁长安两县续志》载,水磨村,以该村原有水磨而得名。从唐到宋、元、明、清的行政划分都记有水磨村。

水磨村的名胜古迹很多,像村东北角的水磨、东南角的古铁索桥、紧挨村东南的堰口、村东口的小石桥、西南角的骆头湾、西南

不远的万军寨、草堂营、草堂寺等等,都有悠久的历史 and 千古流传的美丽传说。水磨是在唐朝苟家为万军寨草堂营磨面的,万军寨、草堂营当时住着很多军队,不但住着汉人的部队,还住有很多少数民族的部队,草堂寺也常有西藏喇嘛来此拜佛住寺,骆头湾是专供少数民族军队和西藏喇嘛存放骆驼的地方,现在当地的人到万军寨、草堂营出门走亲戚或办事,就说到寨子到营里去。铁索桥年代也很古远,相传唐僧当年西天取经走过此桥,虽然是相传,但从古籍里查出,离这里 20 多公里的子午街道天子口村东南角有一条小径,叫神仙路,是唐僧当年西天取经走过的路,神仙路和铁索桥在东西一条直线上,所以唐僧当年取经走过铁索桥也许有其事。铁索桥和水磨村一样古老,老辈人传下来一句话说:“南有铁索桥,北有水磨村。”铁索桥毁于何年其时间不详,但水磨的毁掉,是在改革开放初年,现在村南树丛中还存有一个直径 3 米的大碾盘。水磨村的形成虽然源于苟家,但经过

●我们的村落●

历朝历代的战乱、水患以及疾病等原因，苟家从村里消失，现在有邢家、杨家、黄家 3 大老户。邢家是唐朝从河北紫阳迁来，杨家是从草堂营搬来的，黄家是从祥峪口移下来的，杨、黄两家是元末明初迁入此村。再者铁索桥已不知毁于何年，起码有 100 多年，现任村主任王海军说，前两年他在铁索桥旧址的河滩里挖出上十几根胳膊粗的铁索链，当废铁卖了。百年的河水浸蚀，现在形状仍胳膊粗，可想铁索桥是多么的坚固。

每逢天旱，高冠河的水就很少，水磨村就将河里仅有的水全截进大堰里，下游的东大村浇灌稻田就没有水，东大村人常来到大堰口抢水，水是两村的命根，谁也离不了，常因抢水打得头破血流，你死我活，东大村大人多，一来就是好几百壮汉子，水磨村人少，力单势薄，但他们为了保水，常以死相争，常常被打倒在大堰口旁。有一年干旱，东大村要上大堰口抢水，声言要打死水磨村几个人不可，还要砸掉大堰口，水磨村作了全体动员，誓保大堰口，誓保浇灌稻田的水，用生命和东大人干，并合了人命价，人命价从全村人中出。

第二天东大村来了几百个壮小伙子，手拿铁锹、镢头、棍棒气势汹汹冲到大堰口，大堰口旁早已站着怒目相视，同样手握着重头、棍棒守候大堰口，保堰口里水的水磨村人，两村人一见面就大打出手，水磨村人慢慢地只能招架，无还手之力，不多会水磨村人被打倒在大堰口旁，正在面临着堰口被毁，水磨村上要死人的关键时刻，万军寨、草堂营把部队开过来了，东大村人才离开大堰口，大堰口经过唐、宋、元、明、清、民国多朝的激流冲击、风吹日晒，到新中国成立后已千疮百孔、面目全

非，且难以开闸放水，水磨村人在党和政府的支持下，与 1964 年社教运动中，重新修建了大堰口，现在的大堰口，人们常叫“社教堰”。

水磨村东入村口的南北大堰上有 1 座小石桥，这是杨虎城将军修的，杨虎城当年和他母亲孙一莲到草堂寺上香经过水磨村，当时堰床很宽，而且水流急喘，杨虎城将军就给堰上修了这座石桥，杨虎城将军和他母亲要从高冠河东岸到西边的水磨村再到草堂寺。因高冠河宽没有修桥，过河那天高冠河里架满了 4 寸厚 3 米长的木板。

水磨村从唐代时就是溪流遍地，百亩方塘，水泽之国，莲蓬叠翠，稻田青青，每逢初秋就呈现出“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的美丽景象。但到唐代以后，高冠河发生了几次洪水，冲淹了水磨村所有土地，洪水过后留给水磨村人的是乱石滩、沙土地，很难长出庄稼，人们缺吃少穿，水磨村人从此祖祖辈辈进高冠峪打柴，进深山肩木板维持生活，许多人流离失所，迁往他乡，具有 1000 多年历史的古老村庄到新中国成立前已不足十几户。

新中国成立后水磨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搬石移沙，填土成田，平整土地，终于改造成今天这 325 亩的能打粮食的田地，这巨大的劳动强度，这么大的人造良田的工程，是和新中国成立以来无数届村干部，和全体村民吃了无数次苦，流了无数次汗分不开的。

水磨村所处的地理位置较为特殊，村西就是户县地面，是长安对户县的一个窗户，水磨村的形象就是长安的形象，水磨村人从古到今很注意这一点，对自己做事要求很严格，从不做出格的事，也狠抓子女们的思想教育

问题,1000 多年来,水磨村人质朴善良,以劳动致富,人人都很勤劳,尊老爱幼,孝敬老人,厚德重范,民风淳朴,水磨村人的言行举止,家教书规受到周边群众的赞扬,也常受到户县许多村上人的夸奖,为水磨村人争了光,为长安人争了光。

最近几年,调整全村产业结构,将老传统的种粮习惯,转变成以果业、养猪、旅游接待为主,种粮为副,他们种植优良林木,搞植树造林,引进户太八号葡萄,发挥自己村的众多人文古迹,特别是离长安八景之一的草堂寺

很近的优势,办农家乐,村民的经济收入得到进一步提高。村委会这几年又给村民办了许多实事好事,给村里打了深井,让村民吃上了干净卫生的自来水,进行了村整体规划,村里道路全部打了水泥,又修了村南 800 多米的环村路。最近他们以村周围环境秀美,村西大道直达高冠瀑布,草堂寺的优势,大搞招商引资,现在村南由曲江管委会来开发,村北由高新管委会开发,新的机遇给水磨村人带来更大商业契机,水磨村以后的日子会更幸福,更美好。
(本文选自《长安百村》)

·解字·

“仆”

①

②

③

④

⑤

这是“奴仆充家室”的“仆”字。“仆”字本为会意字。甲骨文①惟妙惟肖,是面朝左站着一个人,人头的上部有奴隶的标记(刑刀),双手捧着“箕”之类的用具,向左下方弯曲的一笔表示腿。此人身穿带有尾巴的特殊服饰(奴隶服)。这就是上古奴隶的形象。金文②的“人”移到左边,右下角是手,手上拿的“箕”已变得不像了。③是小篆形体,伪变得实在复杂,其左边的人形还在,其右边的下部是左右两手,双手捧着一件扫帚一样的东西,实际上这已经变成了左形(人)右声(美)的形声字了。④是楷书的形体,由小篆③直接演变而来。⑤是左形(人)右声(卜)的形声简化字。

“仆”的本义是“奴隶”。由“奴隶”又可以引申为“仆人”。比如徐宏祖《徐霞客游记·楚游日记》：“顾仆守衣洞外。”所谓“顾仆”，就是指一个姓顾的仆人。因“仆”为下贱之人，后来古人对自己的谦称也往往称“仆”，比如司马迁说：“仆非敢如是也。”（《报任安书》）也就是说，我不敢如此。因为仆人也往往服驾车之役，所以驾车的人也可以称为“仆”，比如《论语·子路》：“子适卫，冉有仆。”意思是：孔子到卫国去，学生冉有替孔子赶车。

请注意：以上这些全是“僕”字的义项，另外在古代已经有一个“仆”（不是简化字）字，是向前跌倒的意思。比如《史记·项羽本纪》：“卫士仆地。”也就是说卫士倒在地上。现在还说“前仆后继”，不过这里的“仆”字可以读为 pū(扑)，也可以读为 fù(富)，但决不能读 pǔ(璞)。



端灯奴婢,河南邓县汉墓出土

杨虎城在西安建止园



在西安反围城战役中建有卓越功勋的杨虎城，1929年任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一称西北军）总指挥，1931年任陕西省主席。其时，他特任共产党员南汉宸为省府秘书长。1933年，在今西安青年路中段修建一座别墅，名曰止园。

止园原名仁王院、十方院。杨虎城辟为府第后，为纪念东征回师，取春秋时老子入关“紫气东来”的典故，命名为紫园。1936年，为避蒋介石的猜忌，接受陕西省参议李元鼎的建议，取《左传·宣公十二年》“止戈为武”一词，易名止园。表明就此“止戈”，别无奢求。辛亥革命元老、著名书法家寇遐隶书题“止园”匾额，刻于园的门楣上。

止园占地6亩，是一个美丽、优雅的园林。主楼建筑为拱顶、飞檐、碧瓦、朱柱，具有民族风格。园内绿树成荫，繁花似锦。“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杨虎城对日本侵略者异常愤慨，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和独裁统治也极为不满。从1935年10月开始，他同中国共产党秘密接触，几次商谈联合抗日问题。1935年12月5日，毛泽东、彭德怀派汪锋到西安与杨虎城联系，希望联合抗日。汪锋在止园向杨递

交了毛、彭的信，信中说：“鄙人等卫国有心，剑屦具备，行程二万，所为何来，既达三秦，愿求同志，倘得阁下一军，联镳并进，则山河有幸，气势更雄，减少后顾之忧，增加全军之力。鄙人等更愿联合一切反蒋抗日之人，不问其党派及过去之行为如何，只问今日在民族危急关头是否有抗日讨蒋之诚意，凡愿加入抗日讨蒋之联合战线者，鄙人等无不乐于提携，共组抗日联军，并设国防政府主持抗日讨蒋大计。”此后，杨虎城还在止园掩护过共产党员，接待过党的密使王世英、张文彬等人，经过谈判，达成了协议，确定了联合抗日的原则。西安事变前夕，杨虎城与张学良多次在止园密商发动兵谏。西安事变后第5天，即1936年12月18日，周恩来亦亲临止园，与杨虎城商谈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问题。

1937年6月，杨虎城被蒋介石迫令去职出国“考察”，止园一度为国民党政府招待所。抗战时期，国民党陕西省主席熊斌、祝绍周又以止园为自己的公馆。解放前夕，这里则成了国民党特务机关驻地。止园现辟为杨虎城将军纪念馆。

正确处理地方志事业 科学发展的几个关系

(下)

◎ 李秋洪



(接上期)

四、继承传统与志书创新的关系

处理好继承志书传统与志书创新的关系,使志书具备鲜明的时代特色,这是新一代地方志工作者特别是地方志工作组织领导者不可忽略的又一重要职责。

在继承传统方面,方志在中国有两千多年的传承中,形成了独特的文化体裁。在新编地方志的几十年里,方志人根据时代的发展变化,经过艰苦探索钻研,基本形成了一套得到方志界认可的编纂规范,包括一套相对稳定的篇目框架和体例格式。志书之所以能够在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中始终占有自己独特的位置,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它以客观的方式记载了大量的史实,且并不将记述者的观点强加给后人。这种述而不论的方式和独特的行文体例,是地方志能够发挥存史、资治功能和占有独特位置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现代方志工作者必须遵循方志编纂的基本规范,包括志书的篇目框架和行文体例。这是继承方志文化的基本要求。

在篇目和体例创新方面,正因为每一部志书反映的都是一个时代地方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诸方面基本情况,随着时代的变

迁和社会的发展,方志记述的内容必然随之而变,志书记述体裁形式也需要随着记述内容的变化而有所调整,志书篇目框架和体例的变化尤其如此。第一轮志书所广泛采用的概述(包括全志概述、篇章概述等)就是对传统志书体例的创新。事实上,志书除了篇章体以外,还可以根据内容尝试其他体例如条目体等体例。第一、二轮志书都有采用条目体的例子。篇目框架和志书形式如果不能与时俱进,依然止步于 20 多年前的框架格局和记述手段,将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和结果也淡化为一般日常工作行为一笔带过,没有反映出改革开放 30 年来各地的巨大发展与变迁,这样就难以使志书从内容到形式体现鲜明的时代特色。

在记述形式和手段方面,编纂第一轮志书时由于技术手段和资金的缺乏,大多数志书难以做到图文并茂,志书的表现形式单一。随着信息技术和出版印刷技术的进步,人们的阅读进入读图时代,阅读追求多样化的倾向日益明显。志书不应囿守传统记述形式和体例,应采用相应的新体裁和新形式来表述要记载的内容,如述(概述、综述、小述等)、记(大事记)、人物简介、图照(卷首照片、随文图

片、统计图表、示意图等)、各种索引等等。朱佳木在 2010 年全国省级地方志工作机构主任会议上的讲话中,就提出第二轮志书是否可以有条目体、随文图片和地形地貌图等体例问题。事实上,各种版本的旧志,无论是铅字印刷、雕版印刷,乃至手抄本,基本都采用了那个时代最先进的记载手段或印刷技术所能容许的体裁和形式。如果仍局限于单一呆板的格式和体例,那么志书这种记录时代、记录历史的文化载体就难以体现出时代特色,大大减弱了它应包含的信息量。同时,也难以吸引更多的读者,更谈不上广泛吸引社会各界使用志书资料了。

在质量评价方面,质量是志书的生命力和价值所在,这是方志界的共识。从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到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为保证志书的质量,出台了众多的制度规定。那么,严格按照这些制度规定编纂的地方志,是否可能导致千志一面呢?如何正确处理好严格执行规范与突出特色的关系,是每一部地方志的总纂者在编纂过程中都会遇到的问题。所谓特色包括地方特色、时代特色、行业特色等。在各地各行业送审的志稿中,既有篇目设计严谨合理,时代特色和地方特色突出,资料丰富翔实,数据准确,语言流畅,图文并茂的精品志书;同时篇目框架没有很好地体现地方特有资源、成就或者没有记述好重大事件与重要任务,照抄照搬第一轮志书或者其他地方志书框架,没有反映时代特有内容,没有体现行业亮点的也不乏其书。与此同时,将地方志创新理解为就是彻底颠覆传统,特别是

颠覆诸如述而不论、生不立传等方志基本要求,甚至“剑走偏锋”,随意发挥,将志书作为文学类、新闻类作品来设计和撰写的例子也时有出现。

继承与创新二者之间是一种辩证关系,创新是继承基础上的创新,继承则内在地包含了创新的要求,是一种扬弃的继承。在志书编纂过程中出现一些不良倾向,警示地方志工作组织者和领导者应该对地方志的继承和创新必须有正确的把握。继承的必须是符合历史和时代要求的体例、方式,创新的则应该是有助于提高地方志质量、社会影响力和丰富地方志表现方式。个人在地方志编纂的编纂活动是一种职务行为而非纯粹的个人创作行为。地方志必然要体现执政者所代表和体现的国家意志和社会主流价值观,所以不能将方志编纂工作的创新等同于几个文人的即兴吟哦之作或随意发挥。

五、修志与用志的关系

在一些人看来,修志是以存史为目的的,资治和教化是后人的事。但是在现代社会里,编纂地方志与政府的其他文化职责一样,其内容、形式和功能都必须与时俱进,必须对经济、社会的发展起到促进推动作用,必须对社会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发挥积极作用。在地方志存史、资治和教化三大功能中,存史作为最基本的功能,当然是不会也不能改变的。在此基础上,地方志的资治和教化功能日益突出。地方志工作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必须高度注意到这一趋势,并在实际工作中采取相应的组织和策划措

施,才能真正做到修志与用志并举,修志为用。不仅要组织编纂好各种地方志书,还要利用丰富的地方志资源,开发利用各种地情信息为社会发展和文明建设服务。要积极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印刷出版技术、各种媒体包括音像媒体所提供的广阔空间,开拓地方志发挥社会功能的新途径、新形式。比如为了避免地方志大部头阅读不便的弊端,除了传统的纸质版和已经广为采用的光盘版志书以外,还要加强方志网站建设,出版电子书,让读者使用志书更加便捷;运用音像手段摄制各种影像志,以生动形象的方式让地方志走进更多受众的视野;针对中心工作的需要,精选摘编各种地方志资料,提供给决策机关和有关部门参考;根据不同层次读者群体的阅读需求,编写各种地情图书等等。事实上,一个地方的方志工作开展得是否有声有色,生动活泼,成效显著,为领导和社会各界关注,不仅取决于编纂出质量一流的志书,同时也体现在利用地方志服务社会方面能否动脑筋、想办法、出成果。

六、志书质量与进度的关系

质量是志书的生命。但是,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如何贯彻质量第一的根本要求,处理好志书质量与进度的关系,发挥志书的存史、资治、教化功能,却存在两种倾向:一方面,质量第一的原则在操作过程中往往受到年度绩效考核和政府领导对时间进度要求的冲击;另一方面,地方志编纂进度往往不尽如人意,编纂出版周期一再拖延,从而影响地方志作用发挥。应该说这两种倾向都是不利于地方志

事业的发展。

由于地方志编纂工作体制的关系,地方志工作是政府职能的一部分,它应该也必须接受政府领导和指导,服从和服务于政府的中心工作。一些领导希望在自己任内能够编纂出版志书,或者希望志书的下限后延到将自己任内的工作记录下来,或者给志书编纂规定一个完成期限。应该说这些要求都在合理范畴内,并不过分,只要不影响志书存真求实的质量原则,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任何时间和进度上的要求都应该服从对志书的质量要求,否则由于仓促编纂和出版,志书质量受到严重影响,就不仅是对自己不负责任,也是对人民、对当代和对历史不负责。后人评论一部质量欠缺甚至谬误百出的志书时,必然涉及对志书编纂组织者和领导者的评价。这一点是任何志书编纂工作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不能不预见到的。

就政府组织编纂地方志的直接目的而言,资治和教化是政府组织编纂志书的直接目的,因而志书的编纂和出版要能够满足当代政府领导资治和教化需求。资料距离现任领导在职时间太久远,其记述的地情资料特别是资源、经济发展水平、政治和人才等方面资料的资治功能不免削弱。故地方志的编纂应该在坚持质量第一的前提下,优化编纂队伍人才结构,以制度化、规范化的工作程序,强化工作责任、质量意识和效率意识,加快编纂进度。这才是又好又快地推进地方志事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全文完)

西安人民的好市长 ——方仲如



方仲如,原名廷桢,字干才,化名李惠亭。1901年2月2日出生于陕西咸阳新店村一个农民兼小商人的家庭。幼年丧父,全靠生母及叔父母辛勤劳动持家。1908年至1916年就读于家乡私塾和西安高小,1917年春,考入陕西省立第三中学。1919年春五四运动爆发后,他积极参与西安地区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联合同学走向街头,游行、演讲、散发传单。1922年夏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在共产党员刘天章等人的影响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年冬加入了陕西旅京进步学生组织共进社。次年当选为该社庶务和财务股主任,并负责《共进》半月刊的发行工作。1924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入团后积极参加党所领导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和北京地区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并担任

北大党团组织创建的平民夜校和共进社主办的升学补习班的教员。他一面传授知识,一面热情宣传马克思主义,引导学员投身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他的四个弟妹受其思想影响,先后加入了共产党组织,妹妹方鉴昭于1928年为革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1925年秋,方仲如受北京党团组织派遣回陕开展革命工作。他首先作为共进社的负责人之一,出席了在三原召开的共进社第二届代表大会,向大会报告了共进社近年来的工作情况,并与魏野畴等人共同起草大会宣言。会后,方仲如受韩仲范(北大同学,共进社社员)邀请,到渭南固宁渭阳中学任训育主任兼数学教员。在渭阳中学,方仲如先建立国民党组织,发展进步学生党员二三十人成立了国民党渭阳中学区分部。然后,在其中培养和培养了十余名共产主义青年团员,成立了团渭阳中学特别支部,方仲如任书记。指导团员学习马列著作和进步刊物,组织团员、学生深入周围农村进行反帝反军阀的宣传,帮助成立农民防会。1926年春,还带领学生到蒲城、

富平一带开展宣传活动。其间,他经常与党团赤水特支负责人王尚德、张宗适联系,组织平民夜校,向农民宣传革命道理,提高其政治觉悟。并出钱资助、支持王尚德在赤水职业学校召开陕东国民会议促成会,拥护孙中山召开国民大会的主张,决定发动群众,开展农民运动。会议结束后,临潼、华县、澄城、华阴、大荔、韩城、渭南、固宁等地的代表回到各地,组织了很多平民夜校,向农民宣传革命道理,并成立农民协会。

1926年8月,方仲如奉调回京,转为中共党员。9月,在党组织的指导下参与营救被奉系军阀逮捕的几十名共进社成员。10月初,受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李大钊的委派去绥远冯玉祥部——国民军联军进行联络工作。同年冬担任国民军第五路军政治处长兼国民党党代表,并秘密发展共产党员,在他的建议下,五路军在东出潼关、会师中原的北伐中连战连捷。

1927年夏,冯玉祥追随蒋介石,实行“清党”反共,方仲如和宣侠父、刘志丹等在冯部担任政治工作的20多名共产党员一起被“集训”拘禁,押送出境。后辗转到达武汉,方知武汉国民政府已叛变。方仲如找到党组织后,由党中央派往前苏联学习。1927年9月到1930年10月,方仲如先后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和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政治理论和无线电通讯技术,曾任班长和党的支部书记。

1930年10月,仲如回国到达上海,在党中央和周恩来领导下从事党的机要通信工作。在举办无线电报务人员训练班时,遭到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怀疑,是年12月,方仲如和其他19名人员被捕,关押长达六年之久。在

敌人的酷刑审讯、威逼利诱面前,他严守党的机密,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真实姓名和身份,被判处九年零十个月的有期徒刑,直到1936年8月经友人关中暂保释出狱。

方仲如一出狱,立即回陕西家乡寻找党组织。不久,经中共渭北工委书记周芝轩向上级请示,批准他去陕北。此时适逢西安事变发生,方仲如担任新成立的西北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委员,并出任杨虎城部独立旅政治处长,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和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做出了应有的贡献。1937年7月,独立旅改编,方仲如离开部队,到达延安。经中共中央组织部审查,恢复了方仲如的组织关系,被分配到中央党校工作,先后任理论教员、研究室主任、总支书记、校务部长等职,为党培养了大批干部。

1941年冬至1945年夏,方仲如先后任中共中央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和陕甘宁边区政府被服局局长。当时正值最困难的时期,方仲如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坚持“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悉心筹划,依靠基层办工厂、农场、商业贸易和运输,冲破敌人的严密封锁,克服种种困难,有效地保障了中央党政军机关和边区政府机关的生活供应。在1943年整风运动后期的审干中,方仲如被康生诬为“叛徒”、“坏分子”而中断工作达半年之久。

解放战争期间,方仲如先后担任陕甘宁边区财委副秘书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后勤部部长、西北野战军后勤部副司令员、第一野战军后勤部政委、西北军政大学副校长等职务。

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25日,西安市人民政府成立。从解放后到1963年,方仲

●人物春秋●

如先后任中共西安市委第一副书记,市长,中共西安市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中共陕西省委书记、省政协主席,中共中央西北局监察组长,并当选为全国人大第一、二、三届代表,中共八大代表、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1949年至1956年,方仲如在担任西安市长、市委书记期间,和赵伯平等一起,依靠广大干部群众,认真贯彻党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取得了国民经济恢复和社会主义改造建设的巨大成就,使贫穷落后、千疮百孔的西安面貌焕然一新。方仲如则被人们誉为“好市长”。

1957年至1962年,方仲如在担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省委常委、省政协主席期

间,抱病工作,为陕西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做出了贡献。

1963年,方仲如调任中央西北局监察组组长,为严肃党纪、维护党的纯洁做了大量工作。

“文化大革命”中,方仲如又一次蒙冤,受到冲击和迫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为他彻底平反,充分肯定了他对革命的重大贡献,安排他为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他再一次抱病参加政协工作,积极撰写革命回忆录,多次在医院接待党史工作者,关心和支持褒扬革命先烈的的工作。1983年6月5日在北京病逝。

·解字·

“仁”   

这是“仁人志士”的“仁”字,是个会意字。①是金文的形体,其上边是“人”的侧立之形;下边的“二”,据蒋善国先生说“是重文的记号”,也就是说仍然是个“人”。“人”与“人”相处就要“仁”。②是小篆的写法。③是楷书的形体。

《说文》:“仁,亲也。从人从二。”许慎将“二”看做数字,恐不妥。应为重文的记号。“仁”字的本义是“对人要亲善、仁爱”,比如《庄子·天地》:“爱人……之谓仁。”

《论语·雍也》:“井有仁焉。”若理解为“井中有仁人”那就错了,这里的“仁”是“人”的假借字,是说井中有“人”的意思。果核内的“果仁”,原来均写作“果人”,同样的道理,“仁”也是“人”的假借字。



“雷锋精神” 50 年演进史

1963 年 3 月 5 日，毛泽东亲笔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一个端着钢枪、头戴棉帽的憨实小伙子——雷锋，走进了千家万户，他的名字也传遍共和国大地的每一个角落。

虽然他的生命只有短暂的 22 年，却树立起一座永恒的丰碑。49 年来，每年春天都会开展学习雷锋活动，但不同时代赋予了“雷锋精神”不同的含义。

60 年代雷锋=真善美

1963 年 3 月 5 日，毛主席亲笔题词，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全国上下很快掀起了学习雷锋的热潮。

生于 1960 年的市民韩振华用“席卷中国”来形容 60 年代向雷锋同志学习的行动热潮。在“60 后”眼里，“雷锋”两个字成了一切美好事物的化身，雷锋精神成了“真善美”的象征。

无论是七八十岁的老者，或是咿呀学语的孩童都在学习雷锋。“毛主席的号召就像是一颗威力无穷的精神原子弹，那时候学雷锋

根本不管是不是 3 月 5 日。”

韩振华回忆小学生活，每天上课前要喊口号，上课时老师会专门讲雷锋叔叔为人民服务的故事，学校的墙上标语写的、黑板报上刊登的、宣传栏里贴的、“大喇叭”里广播的，全是关于学习雷锋的宣传内容。“下学后，学校还要组织学生一起学习，让学生们发言，或者写出学习体会，那种气氛感染着每一个人。所有人都早早到学校，抢着干活。有时候去帮





村里的孤寡老人打扫院子，把他家里的水缸挑满水，然后再为他读上一段报纸，大家争着当不留姓名的无名英雄。”

童年里，像雷锋一样涌现出的英雄人物也印在了韩振华脑海里。他仍记得听老师讲“铁人”王进喜的故事，记得学校宣传掏粪工时传祥“宁可脏一人，换来万家净”的精神……虽然听不懂什么叫“人拉肩扛”“运水开钻”，但听到老师讲王进喜跳进泥浆里面用身体搅拌，听到时传祥几十年如一日辛勤的掏粪，看着老师拿着报纸泛着泪花激动地讲，这些半懂不懂的孩子也都感动得泪流满面。

“这都是实实在在的事，没有一点夸张成分在里头。我们当时最单纯的想法就是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学习雷锋叔叔这样的英雄。”

70年代雷锋=爱憎分明

“爱憎分明不忘本”是70年代雷锋精神的精髓和符号。

“雷锋在党的教导下，能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对同志像春天般的温暖。对敌人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那时候我们都要学习雷锋叔

叔鲜明的阶级立场和爱憎分明的革命精神。”70年代中期，十几岁的韩振华当时正在上中学，在那个特定的年代，宣传雷锋精神强调的是他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

一则雷锋日记里写到，在黑暗的旧社会，雷锋叔叔去砍柴，万恶的地主竟用柴刀砍他，这阶级仇恨他牢记在心中。这则雷锋日记中的片段也印在了韩振华这一代成长起来的青少年心中。

在韩振华的记忆里，毛主席号召学习雷锋精神之后，有多位国家领导人曾为雷锋题词，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周总理的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

“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爱憎分明不忘本，立场坚定斗志强……”这首《学习雷锋好榜样》，从60年代到80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几乎人人会唱。“爱憎分明”后紧接着“不忘本”。在韩振华的记忆里，“不忘本”这三个字也是中学时代老师和家长常挂在嘴边的话。

“那时候，老师和家里的长辈教育我们长大了不能忘本，要知恩图报，如果取得了好的成绩不能忘了有谁帮过我，解决了困难之后不能忘了是谁雪中送炭，也要我们记住我们能吃得饱穿得暖都是因为共产党。”

直至多年后，韩振华也常用“不忘本”三个字去教育自己的女儿。他常说现在这社会，太多人忘本了，失去了原来的“真善美”的本性。

80年代雷锋=钉子精神

在上世纪80年代,学习雷锋的“一切行动听指挥”“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和刻苦学习的“钉子精神”、将雷锋精神用到自己的实际工作中去……这些概念成为那个时代学习雷锋精神的主旋律。

高中毕业的韩振华离开学校,进了一家国营的机件厂,和父亲一样成了一名技术工人,开始承担起养家糊口的重担。在韩先生的印象里,雷锋叔叔爱憎分明的“特点”被不知不觉弱化,厂里宣扬得更多的是雷锋的“钉子精神”,“学习雷锋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

韩振华说,那时候的教育不强调个体化,而是强调集体主义,学生们的志愿也都是更好地成为集体的地一分子,更好地像雷锋叔叔一样,发挥光和热,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成绩。

韩振华从第一年当学徒,就参加了厂里举办的学习班,一方面是由师傅带着学技术,另一方面就是要学文化、学政治,“人人学雷锋、个个争先进”“学习雷锋同志的钉子精神”。



“刚上班的时候,厂里宣传张秉贵,张秉贵生前是北京市百货大楼售货员,他练就了两项绝技:‘一抓准’和‘一口清’。”回忆起那个年代学习雷锋精神的经历,韩振华至今印象深刻的就是“一把抓”张秉贵,一顾客要半斤,他一手便能抓出5两,而且算账速度快而准,能一边称糖一边用心算计算。听了他的事迹,韩振华自己心里也十分佩服。

那时候,厂里的宣传标语已经不再是“向雷锋同志学习”几个大字,而是将雷锋精神细化到工厂里、细化到每个人工作的岗位上,提倡大家利用一丁点儿零散的时间不断地学习。“如果不是用心学习花时间去练习,张秉贵不可能抓糖抓得那么准。”

90年代雷锋=爱岗敬业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经济改革进入高潮。时代变了,雷锋精神在这一个时期的诠释也就发生了变化。1991年江泽民在一次讲话中指出:“雷锋精神实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了人民事业无私奉献。”随后,学雷锋活动重点转移到了“在岗位上体现出奉献精神”,先后涌现出不少像李素丽这样在平凡岗位上做出成绩做出贡献的“岗位模范”。

在平时工作的过程中,“雷锋精神”四个字不再那么普遍的被提及,但包括韩振华所在的公司在内,北京开展了向李素丽同志学习的行动,当时的李素丽等劳模成为“雷锋精神”的接力者。

在学校,进入90年代,学习雷锋精神的氛围已经跟之前的三十年完全不同。韩振华唯一的女儿开始上小学。与他60年代上小学时所有同学争当小雷锋不同,在韩振华女儿这一代人心中,雷锋



叔叔的形象已经被逐渐弱化。

学校里会组织学雷锋小组,但都是3月5日前忙活一阵儿。到敬老院看孤寡老人、去公交站擦站牌儿、两两一组结对子到军属家慰问……过了3月份,这些做好事儿的行动就坚持不下去了。

韩振华感慨,女儿这一代80后学雷锋,真是应了网上流传的那句话,“雷锋叔叔没户口,3月来了4月走”。

在这个年代,雷锋形象的丰满与完整也在韩振华女儿这一辈人心里,被某些刻板印象所取代,雷锋精神在社会中成为艰苦朴素、助人为乐的代名词,学生们头脑中的雷锋形象只剩下了灯下埋头补袜子和帮助老人找儿子。

90年代的校园里,孩子们的想法十分简单,学习雷锋做好事就是光荣,就能得到老师表扬得到小红花。

21世纪雷锋=?

说起雷锋的故事,韩振华还能凭记忆讲出很多很多。但如今进入了新世纪,可以细数的“雷锋故事”却越来越少。

有一年,韩振华小侄女的学校在3月5日前搞学雷锋主题活动,要求学习一段雷锋的事迹并且在台上演讲。韩先生从书架上找出一本雷锋日记,讲起雷锋在部队的故事:“天快暖了,连队里发放夏衣,每人两套单军装,两套衬衣,两双胶鞋。发到雷锋的时候,他却说:‘我只要一套军装,一件衬衣和一双胶鞋就够了!我身上穿

的军装,缝缝补补还可以穿,剩下的一套衣服交给国家吧!’”讲完这段,“00后”的小侄女天真地问韩振华:雷锋叔叔为什么那么傻啊?

韩振华感觉,现在的生活比60年代好了,穿得暖吃得丰富,可是人的心已经变了。

十年前的一个夜里,韩振华开车回家路上,突然发现在马路中间躺着一个人,身体还有微弱的颤动。没想过会不会被人“污蔑”,韩振华第一反应是停下车,给这位喝醉酒发病的病人叫了救护车。而在今天,即便像他这样自幼接受雷锋精神洗礼的60后,在选择是否帮助一些陌生人时,也会犹豫,认为要“看情况而定”。

“学雷锋”在本质上是一种“道德”举动,无论社会多么浮躁、功利之风如何盛行,对助人为乐、与人为善等道德价值的弘扬不能放弃。75岁坚持数十年在天安门广场上捡垃圾的刘玉珍老人,让我们看到了坚守;发现大火时没有独自逃生、而是逐一拍开邻居房门的12岁小姑娘夏娟,让我们看到了希望。他们或许是21世纪雷锋精神的最好注释。

古代中国的“两会”和“提案”

从制度层面来说,现代“两会”制度为共和国首创,中国古代是没有的。但从议事形式来讲,中国古代也有类似的形式。当然,古代中国的国家议事体系与现代有着本质的区别。

古代是皇帝一个人说了算的“家天下”,皇帝虽自称天子,但他知道“一个人拍脑袋”的局限性,于是有了“朝参”和“集议”。“朝参”又叫“朝会”,“集议”也称“议会”——这便是中国古代的“两会”制度。

“朝参”由皇帝亲自主持,是小范围的,是百官进入皇帝的办公大厅(朝廷)参拜皇帝的一种形式。

进行重要的人事任免和重大的工作安排、典章颁布时,皇帝都会开“朝会”。有资格参加“朝会”的,都是相当于今天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各部委办主官,所谓“三公”、“九卿”,最低也得是副厅级的正五品官员。

“朝参”实是一种御前会议或内阁会议,有点类似解放后的最高国务会议,中央工作会议。时间不长,但相对频繁。到唐代,“朝参”变成了“常参”,每日或隔日举行,成了制度化。

“集议”则由“三公”或地位相当于“三公”的大臣主持,皇帝一般不参加。集议实际上是应皇帝的要求或同意才开的,规模可大可小,参会者的范围比朝参复杂。集议通过的议案都是要认真执行的。

古代“两会”代表都是些什么人

“集议”也分中央和地方,与全国人大和地方人大相似。但与今天“人大”代表都是选举出来的不同,参加“集议”的人员都是由官

方决定和领导推举,代表中没有普通群众。从史料上来看,主要有四类:

一是相当于今天省部级高官的“二千石”以上大臣才有资格,实为官僚和利益集团的代表。

二是“地方代表”,以分封在外、待遇达到一定级别的列侯为主。列侯都是功臣名胄或其后裔,实为贵族和特殊阶层的代表,这部分代表是不能参加“朝参”的。

三是“专业代表”,主要是列大夫、博士、议郎这些专职谏官。这类代表参政议政能力强,因为都是领俸禄的,也属“公务员”群体的代表。

另外,在需要时,还会有“基层代表”。汉昭帝时召开“盐铁会议”,特别召集 60 余名地方和基层的代表参会。

这类代表以饱读诗书、喝过墨水的“贤良”为主,表面看是来自地方和基层,但因为是相当于今天省市一把手的郡国国主和地方富豪推举出来的,实为学术界和富人的代表。

古代“两会”议案很难一致通过

古代中国的“两会”很注重民主气氛,“代表们”敢直抒胸臆,有人甚至敢在朝会上当面指出皇帝的不是。

在“集议”上,议案也很难“一致通过”,有时还会出现“经年不决”的现象。西汉末年的王莽新朝,一次议会的议题之一是讨论并颁布官员的工资制度,结果集议了好几年,也未能拿出各方都能接受的意见。

由于政策迟迟不能出台,导致上自公侯、

下至小吏都拿不到工资，即所谓“皆不得俸禄”，实在罕见。

古代最著名的一次“集议”是“盐铁会议”。会议时间在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二月，会上，60余名由相当于今天省市一把手的郡国国主推举出来的地方和基层代表，与以御史大夫（“三公”之一，相当于副总理）桑弘羊为首的京官集团，进行面对面的激烈辩论。

会议由丞相田千秋主持，重点议题是对汉武帝主政时期国家施政政策的得失，进行讨论。地方和基层代表们对盐铁官营、平准均输、酒类专卖、货币发行等多项政策提出了尖锐批评，强烈要求废除之。

桑弘羊深得汉武帝的信任，曾统管中央财政近40年，是这些政策的实际制定者，对“贤能”和“文人”的否定意见不以为然。会议最后经过表决，通过了废除全国酒类专卖和关内铁官制度，打破国有公营的垄断。

“提案”影响力与皇帝的好恶

古代共商国是，除了“朝参”和“集议”这样的“两会”形式外，还有一种“谏议”制度。所谓“谏”本义就是规劝君主，谏议自然就是给皇帝行为和决策提意见，专挑毛病和不足。

谏议既有会议形式，也可个人约谈，有时还会与集议混在一起，但与集议明显的不同是，谏议多有“提案”。

与“集议”相比，谏议制度在古代中国影响很深，这与皇帝的重视是分不开的。实际上此制度原本就是皇帝提出来的，谏官往往也由皇帝亲自挑选和委任。

谏议制度要求拿出提案供皇帝和中央决策时参考。谏官也都会积极建言献策，扮演“民主监督”角色。

西汉中早期皇帝都重视谏议制度的建

设，汉武帝刘彻尤其重视，出现了不少出色的谏官。最著名的一位是“新儒学”的代表人物董仲舒，他上交给汉武帝的提案《举贤良对策三》，可以说是古代中国影响最大的“提案”。

提案的中心观点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观点得到了汉武帝的肯定，提案被采纳，儒家地位骤升，从此开始左右古代中国人的意识形态。

古代谏官中白居易当得最窝囊

实际上，即便皇帝很开明，也很难不被暗箭中伤。西汉盛世“文景之治”就是在贾谊、晁错这些“博士”谏官的畅所欲言中出现的。但他们的结局都不好，贾谊因建言有功，被汉文帝破格提为太中大夫一年后，便因遭群臣嫉恨，贬为长沙王的太傅。

晁错贵为汉景帝的“智囊”，因上交《削藩策》“提案”，在“七国之乱”中由汉景帝亲自下诏，斩杀于街头。

古代谏官中，当得最窝囊的大概是中唐时的著名诗人白居易。白居易于元和三年（公元808年）被唐宪宗李纯破格提拔为谏官左拾遗，当上了从八品的“处级干部”。

白居易当时太把自己当一回事了，大事小事都“建言”。唐宪宗要提拔宠臣吐突承璀，他坚决反对，结果被皇帝斥骂为“小臣不逊”，贬为江州司马，逐出京城。

此后，白居易再也没有上交提案的机会，只能写《长恨歌》自我安慰。

宋代以后，谏议制度变成了摆设，元代干脆取消谏院。到明清时，古代中国的“两会”和谏议制度所散发出的民主精神几乎不存，明世宗朱厚熜甚至把持不同政见、反对给他生父兴献王朱祐杬上尊号的朝臣当场杖毙16人，另外134人被关进监狱。



历史上草船借箭的主角是孙权而不是诸葛亮

说起草船借箭，人们都会想到诸葛亮，那是《三国演义》中的神来之笔，把一代军师诸葛亮的智谋演绎得出神入化。然而，《三国演义》终究为小说，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草船借箭非诸葛亮，而是孙权。

222年，孙权执掌东吴政权，曹操亲自带兵南下，两军在濡江口对峙。曹操率领的大军被孙权阻止在这里，无法前行。曹操便命军队安营扎寨，待机出动。孙权为了探察曹操水军部署及虚实，冒险乘大船察看曹军水寨，不幸被发现。曹营乱箭齐发，箭如雨下，落在孙权船上。孙权虽未中箭，但面向曹营的船身，因落箭太多而倾斜，随时可能翻覆。千钧一发之际，孙权急中生智，下令调转船身，让船另一边受箭。没过多久船两边中箭的数量变得差不多了，船只平衡，恢复平稳。

孙权就这样靠智慧安然脱险，还意外获得曹军“赠送”的大量雕翎箭。后来孙权曾经再度乘船探营，当船接近曹营时他还令士兵

大声擂鼓。曹营诸将领见状非常气愤，纷纷要求出击活捉孙权，曹操怕再上什么当，严令全军严守不动，更不得乱发一箭。孙权也不客气，随心所欲地四处游走把曹营参观了个够，直到天快亮的时候，才恋恋不舍优哉游哉地回去了。曹操见后无限感叹：生子当如孙仲谋！

也许孙权到死都不会想到，罗贯中竟然将自己的伟大创举移花接木至诸葛亮身上，还将自己的两位爱将周瑜、鲁肃羞辱了一番，如果孙权在天有灵，肯定要找罗贯中算账，要问他为何将自己和爱将的一世英名竟然算到诸葛亮头上。

然而，历史竟是经常重演，孙权借箭并未用草，只是用船，而且是临时生智，而后来的历史竟然真正上演了用草借箭的故事，但没有用船。那是唐朝安史之乱时，叛军攻打雍丘，唐将张巡率军抵抗，被围困在雍丘四十多天后，与外界完全隔绝的守城唐军的箭用完了。守城没有了箭，就如同现代战场上的士兵

没了子弹。就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张巡心生一计，命人用稻草扎成一千多个束草人，并穿上黑衣服。入夜后，张巡下令用绳子绑着千余稻草人，沿着城墙垂下。叛军发现有动静，以为张巡派出敢死队出城袭击，马上万箭齐发，不计成本不停地狂射。直到天快亮的时候，叛军发觉上当了，这才停止射箭。张巡守军将扎满了箭的稻草人拉上城来，拔箭一算，有数十万支之多。有了箭，唐军士气大振，守住城池打败叛军的信心空前高涨。张巡见民心可用，便趁热打铁，在第二天晚上再度垂下一些黑衣人。敌兵发现后，以为是张巡故伎重施，不仅不攻击，反倒开始嘲笑起张巡来。谁料，这些“草人”落地后，竟然变成了活人，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杀过来。全无防备的叛军被杀得大败，四散奔逃溃不成军。雍丘之围被解。

好的计谋总被后人运用，而且更加出神入化，当年八路军在抗日期间，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自然就是在演绎“草船借箭”的故事，虽然道具也许不是用的草，也不是用的船，但内涵却是一样，都是孙权当年用船借箭的另一种形式，只是后人也许不知道是孙权的伟大的创造，还以为是诸葛亮的英明。

孔子知兵有勇，看来是被历代史家淡忘了。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知礼义的君子，他一生极谨慎地谈论勇力、叛乱、怪异和神鬼；也非常谨慎地对待斋戒，战争和疾病。他毕其一生精力主张仁政德治，反对诸侯之间争雄称霸，企图以一己之力恢复周礼去挽救四分五裂的天下，这是他的宏伟理想。但他的这个伟大理想最终成了他的乌托邦。

卫灵公曾经问过孔子军旅之事，孔子回答说：他不懂得祭祀，不懂得军事。

达巷那个地方有人说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孔子听到这句话后对他的弟子们说：我哪一点做得好呢？是御马吗？是射箭吗？我还是御马吧。

子贡问孔子，一个国家要想安定政治平稳，需要哪几条呢？孔子说：足兵，足食，民信之矣。子贡又问老师：“如果没法具备这三样必须去掉一条，哪条可以先去掉呢？”孔夫子说：“去兵吧！可以不打仗，但是人总得吃饭。”子贡不甘心地追问道：“如果两条都满足不了，那么再去那一条呢？”孔夫子很严肃地告诉子贡说：去食！人无非一死。

作为一个政治家，孔子给人的印象是智谋和勇气似乎稍逊一些。那么，孔子真的只是一个“知礼而无勇”、谦谦君子般的文弱教书先生吗？

读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齐鲁夹谷会盟一段，孔子在鲁国任大司寇（类似掌管全国公安、司法的

孔子真的只『知礼』而『无勇』吗



行政长官)时,协助鲁定公参加与强邻齐国在“夹谷”(今山东省莱芜县境内)签订盟约之事。那个感觉就是:要好好擦擦眼镜。

夹谷会盟尽显英雄本色

公元前 501 年(鲁定公九年),孔子在鲁国任中都(今山东省汶上县西)长官,治理一年卓有政绩,四方都效仿他的治理方法。公元前 500 年鲁定公十年,孔子由中都宰升小司空,由小司空升大司寇(类似掌管全国公安、司法的行政长官),摄相事,使鲁国渐渐变得强大起来。

齐大夫黎锄向齐景公进言:“鲁任用孔丘,鲁国正在变得强大起来,照此看来会危及齐国的。”齐景公也忧虑起来,想法要抑制鲁国的强大。派使者出使鲁国,商量在夹谷山会

盟缔结两国和好。

鲁定公没有多想,备好车辆随从准备去赴约。定公让孔子随同前往,担任盟会时鲁国的相礼(司仪)。

孔子对定公说:“我听说办理外交必须要有武装准备,办理武事也必须有外交配合。从前侯出了自己的疆界,一定要带齐必要的官员随从。请求您安排左、右司马一起去。”孔子认为,鲁国与齐国相比是小国,况且齐国侵占了鲁国的土地,参加这样的盟会必须小心。请求派左司马乐颀,右司马申句须,率精兵车 500 乘护驾前行,届时伏兵于夹谷隐蔽之处,以备不测。这就是孔子所说的“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定公听从孔子的建议。

这段话把孔子高瞻远瞩、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韬略表现了出来。这岂是一个只能纸上谈兵的“教书匠”所能表现出来的。

公元前 500 年夏,定公与齐侯在夹谷相会。齐国在夹谷修筑了盟坛,坛上备好席位,设置了三级登坛的台阶。齐国本想在盟坛上劫持鲁定公,以迫其成为附庸。因为齐国一直轻视鲁国,根本就拿“知礼而无勇”的孔丘不当回事,想来个“不战而屈人之兵”。《左传》中也有这样内容的文字,透露了齐国人的想法:“孔子只懂得以礼治国,不懂得使用武力。会盟就是要鲁国臣服齐国,如果会盟不成,就让齐国莱人武力劫持鲁定公,还怕鲁不臣于齐吗?”

这场看似友好的会盟才是最早的鸿门宴,从一开始就埋藏了重重杀机。

会盟一开始，彼此馈赠应酬的仪式行过之后，齐国就表现出一副咄咄逼人的老大姿态。齐国礼官叫演奏四方之乐，旌旄、羽葆、矛戟、剑盾一齐登场，鼓噪刺耳。当地莱夷人手持兵器蜂拥而上，一直冲到定公面前。鲁定公大惊失色，惊恐万分不知所措。《谷梁传》也有记载：“齐人呐喊着围了上来，手持兵器欲劫持鲁定公。”

情形万分紧急之际，孔子立即快步登台，还差一级台阶时便扬起衣袖一挥，临危不惧义正词严高声喝道：“齐鲁同为天子诸侯，就应行周公之礼。两国国君为和好而来会盟，为什么在这里演奏夷狄的舞乐来现丑呢！”又说：“齐鲁两国的国君友好相会，而让这些早已亡国的边远东夷俘虏来捣乱，这是斯文扫地，蒙羞的不仅是鲁国，更是齐国。请命令有司，立刻让这些人退下去。”

孔子凛然气势使齐国在场的文武官吏张口结舌心中恐惧。齐国主管官员看看齐景公的眼色，齐景公面有愧色，窘迫之下挥手叫企图劫持鲁定公的齐人退下去。“俾其君悔过而谋士气夺，裔兵偃戈，惟孔子听”。

会盟是齐国人精心策划的，齐国不甘心落下风，管事官员又说道：“请演奏宫中的乐曲。”又耍花招，以献乐助兴为由用轻狂淫秽艳词滥调，不堪入目的表演来羞辱鲁定公。一些歌舞杂技艺人和身材矮小的侏儒都前来表演了。孔子看了又急跑过来，最后一阶还没有迈上就说：“普通人敢来胡闹迷惑诸侯，论罪当杀！请命令主事官员去执行！”依周公礼法进行了合理的反击。于是主事官员依法将他

们斩首。

就这样，会盟走向被孔子掌控了。齐国兵力方面准备不足，又不能动武力，再加上探知鲁国还有军队埋伏着，齐国的阴谋彻底破产了。

孔子看到齐国不怀好意的局面，再呆下去恐有不测，便让司仪各自引导国君祭拜天地。无奈之下的齐景公，决定盟好。

两国会盟，盟约应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协商缔订。而夹谷会盟的盟约却是齐国早在会盟之前就已拟好，只拿到会上来让鲁国签署。齐方提出齐国出境征讨时，鲁国必须跟随兵车三百乘，否则，就是破坏盟约。

孔子考虑到两国强弱悬殊的客观形势，毕竟齐强鲁弱，鲁国不想要战争。这一条虽然难以拒绝，但却不能无条件地接受。见眼下的斗争形势有利，孔子请求鲁定公答应这一条。孔子说：“大王所言极是，兄弟之间理应相助。然则，昔者齐所侵鲁汶阳等地，若不归还，何谈兄弟之谊，手足之情呢？”孔子说既是兄弟之邦，一国出兵，另一国当随兵车相助。但鲁国也有一个要求，都是兄弟了，齐国就应当归还先去占据的鲁国汶阳、郚邑（今均在山东宁阳北）和龟阴（今山东泰安东）三地，否则，也是破坏盟约。

齐国没有想到孔子会来这么一手，可是已经会盟了，没有理由可以拒绝。无奈之下，只好答应把这三地归还鲁国，并写入盟约。

夹谷盟会上，弱小的鲁国能争取到平局就是胜利。却在孔子机智果断的努力下，扭转了局势，为鲁国和鲁君争得了尊严，鲁国不但没有成为齐国的附庸，还使齐国归还了鲁国

的三地取得了一定的胜利，无疑是盟会的胜利者。

这次会盟后，孔子在鲁国的地位大增。

这段故事把孔子的临危不惧，随机应变，折冲樽俎，大义凛然的英雄气概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这又岂是一个只能纸上谈兵的“教书匠”所能做出来的。

英雄最终落寞地流浪天下

夹谷会盟后，心高气傲的齐国不甘心落在下风，开始对鲁国施用美人计。齐国选了 80 名能歌善舞的美女都穿上华丽的衣服，还精心挑选了 120 匹身上有花纹的马，一起送给鲁定公，胸无大志的鲁定公被迷花了眼，开始不上朝理政。孔子逐渐受到冷落。

有一次，鲁国举行郊外祭祀之后，又违背常礼，没把祭祀肉分给孔子。这让孔子感到他被遗弃了，鲁国已经没有他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的舞台了。孔子愤而辞官离开鲁国，率弟子开始了长达十四年的周游列国流浪天下。

公元前 484 年，齐国伐鲁，孔子弟子冉有为季氏率领军队，与齐军战于鲁郊，打败了齐军。季康子问他是怎样学会作战的，冉有说，向孔子学的，于是向季氏推荐孔子。这又告诉我们谁说孔子只是“知礼而无勇”。孔子也说过，一个国家要想安定政治平稳，离不开“足

兵，足食，民信之矣。”他说不懂军事作战，那是因为这方面与他一贯倡导的德治相违背，因而他不语“力、乱”以及“怪、神”了。

季康子派人迎孔子归鲁。至此，孔子结束了十四年颠沛流离的流浪生活。

孔子是中华文化的集大成者，他创立的儒学文明又深深地影响了他身后的中国历史。孔子的成就是由“自学与教人的事业”，“著述的事业”和“政治事业”三个部分组成。“文事武备”与“武事文备”是其政治事业的重要构成部分。

孔子在夹谷会盟前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在夹谷会盟中处变不惊临危不惧，挫败了齐景公要挟鲁国的一系列阴谋，扭转了局势，为鲁国和鲁君争得了尊严。这不仅是孔子从政后在外交上的一次大胜利，而且也是他政治生涯中最为精彩辉煌的一笔，也是一曲绝唱。

谁还会说孔子只“知礼”而“无勇”呢！谁还会说“百无一用是书生”呢？





戊戌第七君子 何以脱难

不料慈禧大怒，责怪荣禄为帝党开脱。荣禄马上跪地申诉说徐致靖只是个书呆子，根本不懂得新政，只是在维新派里唱昆曲、玩围棋而已，而且在宣布维新后的3个月内，皇帝一次也没有召见过他。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以后，谭嗣同等六人在北京菜市口刑场慷慨就义。他们就是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戊戌六君子”。

然而很少有人知道，慈禧太后最初要处斩的不是6个人，而是7个人，那第七位君子就是当时官至二品的礼部右侍郎徐致靖。

徐致靖(1826~1918)，字子静，江苏宜兴人，思想开明，拥护革新，曾给光绪皇帝上过有名的《人才保荐折》，保荐过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张元济等维新人士。当年慈禧发动戊戌政变，囚禁光绪皇帝，大肆逮捕维新派官员。徐致靖也进了监狱。

慈禧亲笔批文立即斩决的头一个人就是徐致靖。李鸿章与徐致靖的父亲是同科进士，又是密友，私交很深。李鸿章就想方设法救徐。他知道自己出面救徐致靖不妥，只好求慈禧的红人荣禄帮忙。碍于面子，荣禄只好向慈禧说情。

慈禧立即派太监查询。因宫廷规定，皇帝召见任何人都要有记载，一查便知。太监核查后回报说：3个月内皇帝确实没有召见过徐致靖。这下慈禧稍有转色，再加之荣禄是她最宠信之人，慈禧就改判徐致靖为“监候”(即死缓)。

徐致靖大难不死，“戊戌七君子”变为“六君子”。徐致靖出狱后，一直居住在杭州，改名徐仅叟，意思是“六君子”被害，刀下仅存的老



大唐西市



在唐朝长安有东市(今西安交大一带)和西市(今劳动南路附近)两大市场,东市主要服务于达官贵人等少数人群,而西市则是大众化、平民化,有大量西域、日本等国客商在内的国际性大市场。当时西市占地 1600 多亩,建筑面积 100 万平方米,有 220 多个行业,固定商铺 4 万多家,被誉为“金市”,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商贸中心。根据权威机构调查,也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商贸中心。在这里曾发生了大量的历史趣闻轶事,留下了大量文人骚客的墨宝。如李白的《少年行》,杜甫的“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其中都提到或涉及到了西市。

大唐西市项目是在唐长安西市遗址上重建的综合性商贸旅游项目,项目总规划面积约 500 亩,总建筑面积约 100 万平方米,总投资 35 亿元人民币,是目前国内唯一一个在原址上重建的大型商贸与旅游主题区,被列为“陕西省、西安市十一五重点工程建设项目”、“市、区两级重点建设项目”和“全国光彩事业项目”。项目位于西安古城墙西南方唐长安城西市遗址,地处西安市主城区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咽喉要地,与明城墙毗邻相

望,和西安市西大街仿古一条街互通声气,距市中心钟鼓楼仅 3 公里,属西安市商业繁华地带。

大唐西市划分为特色步行街、现代商业区、休闲娱乐区、宾馆、办公区等五大功能区域,使市民和游客在购物、旅游的同时,感受到浓郁的唐文化气息,形成“寻古看秦俑,购物逛西市”的新的旅游消费热点。

大唐西市项目通过借鉴大唐“开放、博大、包容”的情怀,充分体现大唐的“精、气、神”。并以世界级的丝路文化和大唐的历史文化为题材,以多彩的异域文化和风情为主线,打造以丝路文化风情旅游、休闲购物和娱乐商业为主导,以高档的商务型酒店、办公和居住为辅助的都市体验旅游中心、休闲商业中心和区域性的高档商务中心。同时通过唐文化与现代商业模式的完美结合,让人们“走进历史,感受人文,体验生活”。

大唐西市项目是商业和文化精神的浓缩,更是丝路文化和风情的结晶。商业功能与历史文化在此交融,古代与现代在此辉映,东方与西方在此碰撞,形成了大唐西市独有的多元化、多层次的文化和商业特质。



西安 小雁塔史话

西安市的小雁塔位于西安城南约 1 公里的荐福寺内,因低于大雁塔而称小雁塔。建于唐代景龙年间(707~710 年),至今已有 1000 多年的历史了,该塔采用密檐式砖结构建筑,形状秀丽,蔚为壮观。原为 15 级,约 45 米高,现存 13 级,约 43.3 米高。塔平面为正方形,各层南北两面均开有半圆形拱门,塔内设有木梯,游人由此登上塔顶可以饱览西安市内风光。

小雁塔是西安的著名旅游胜地,但人们却很少注意到小雁塔为什么会四离三合、迄今仍巍然傲立的这个谜团。

在小雁塔底层北门楣有明嘉靖三十年“王鹤刻石”的刻石题字,上面这样写道:“荐福寺塔肇自唐,历宋、元两代,明成化末长安地震,塔自顶至足中裂尺许,明彻如窗户,行人往往见之。正德末地再震,塔一夕如故,若有神合比之者……”这是明确记载小雁塔的第一次自裂自合。原来小雁塔是由于一次地震裂开的,不过又在另一次地震中自己将裂缝合上了,真是奇怪之极。

清初名学者贾汉复、赵王士禛等人记述

小雁塔的另一次裂合:“荐福寺塔……十五级,嘉靖乙卯(1551 年)地震裂为二,癸亥(1563 年)地震复合无痕,亦一奇也。”这第二次的裂开,距王鹤刻字所记不到 5 年,经过了 8 年又第二次自然复合起来了。清道光十八年(1838 年),钱咏在其著作《履园丛话》中又有这样的记载:“西安府南十里有雁塔,嘉靖乙卯地震,塔裂为二,癸亥复震,塔合无痕。康熙辛未(1691 年)塔又裂,辛丑(1722 年)复合,不知其理。”后面记载的是前一次

砖塔复合 128 年后小雁塔又一次裂开,再经 30 年后自然复合的第三次裂合事实。

第四次裂开虽无具体时间记载,但是解放后许多人共睹的事实,自顶至足有一尺多宽的裂口,后经西安市人民政府进行加固和整修,才恢复了原来的旧貌。

小雁塔的自裂自合共有三次,这到底是怎样形成的呢?近年来有人推测:小雁塔的离合和西安地区地面裂缝的发展和消亡的机理是一样的,是地壳运动在不同物体上的不同表现,是一种“同质异相”,即地裂、塔裂,地合、塔合。一般裂开时要快速猛烈一些,容易被人们注意到。而合拢起来时则要缓慢得多,地壳在均衡和调整应力的作用下,会自动缓缓的合拢。由于合拢的速度小,所以一般不为人们注意到。

这种以地壳运动引起小雁塔的离合之说,还不能完全令人信服。因为除了小雁塔之外,西安地区在同小雁塔离合的三次地震中,并没有其他自动离合的例子出现,为什么唯独小雁塔会四离三合呢?也许当科学更发达的时候,小雁塔离合之谜就会被揭开了。

隋唐长安城门趣闻(十)延兴门

延兴门,隋唐长安外郭城东面偏南门,遗址在今西安东南郊铁炉庙村南。

1.延兴门地据乐游原

乐游原位于唐长安城东南隅新昌坊与升平坊一带,为一隆起的高原。长安城内平均海拔高度为 412 米左右,而此乐游原处海拔高度达 450 米~455 米,为都城内地势最高处,延兴门即地据此冈原之上。



乐游原因汉宣帝时在此置乐游苑而得名。唐代时期,太平公主曾在此原修筑园林,建有亭台楼阁。后来唐玄宗又将此原赐给其兄弟宁、申、岐、薛诸王,再加兴造,成为都城地区以冈原为特点的自然风景游赏区。这里地势高耸,登原远眺,四望宽敞,京城之内,俯视如掌。同时,它与南面的曲江芙蓉园和西南的慈恩寺大雁塔相距不远,眺望如在近前,景色十分宜人。因此,都人来此游赏者络绎不绝。尤其是每年三月上巳,九月重阳,长安仕女游赏,就此袂褰登高,幄幕云布,车马阗塞。唐代著名诗人张九龄、杜甫、韦应物、杜牧等

先后都来此游赏,留下了很多吟咏的诗篇。其中李商隐的《乐游原》诗:“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更是因乐游原而作千古传诵的佳句。

2.延兴门西临青龙寺

延兴门西临新昌坊南门之东的青龙寺。该寺创建于隋初开皇二年(582年),原名灵感寺,唐武德四年(621年)被废,龙朔二年(662年)复为观音寺。唐睿宗景云二年(711年),改名青龙寺。寺据乐游原冈原之上,唐人朱庆余《题青龙寺》诗云:“寺好因冈势,登临值夕阳。青山当佛阁,红叶满僧廊。竹声连平地,虫声在上方。最怜东西静,为近楚城墙。”

青龙寺是长安佛教密宗的重要传播之地。代宗大历(766~779)年间,不空三藏的密宗教徒惠果和尚主持此寺,宏宣“真言大教”。德宗时期,日本平安朝派遣入唐求法的“学问



僧”、“清益僧”来长安,被称为“入唐八家”的日本僧人,有六人(空海、圆行、圆仁、惠运、圆珍、宗睿)都曾在青龙寺受法。其中空海在青龙寺拜惠果为师,在佛经、梵文、诗词、书法等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宪宗元和元年(806年),空海学成回国播教,成为“东密”的开山祖师。

唐代时期,青龙寺还是长安四大戏场之一。当时,百戏演出在长安城已形成了以寺院为主的四处固定的戏场。宋人钱易《南部新书》载:“长安戏场,多集于慈恩,小者在青龙,其次荐福、永寿”。慈恩寺、青龙寺、荐福寺、永寿寺都在风景名胜、游人最多的地方。戏场规模都很大,可以同时有多种节目演出,容纳众多的观众。如被看作“小者”的青龙寺戏场就可以“座客千官盛,场开百戏容”(苏颋《奉和恩赐乐游园应制》诗)。

3.延兴门内哥舒翰宅

哥舒翰(?~757),唐代名将。突厥族突骑施哥舒部人。勇而有谋。能读《左传》《汉书》。四十岁后从军河西,驻守边防重镇临洮一带,屡破吐蕃的进犯。天宝六载(747年),官拜左仆射平章事,为陇右节度使,兼河西节度使,封平西郡王。天宝十四载(755年),安禄山反。次年,哥舒翰统兵20万守潼关。当时他身体病弱,因受杨国忠猜忌,被逼出战,兵败遭杀害。居宅在长安延兴门内新昌坊。旧址约在今西安东南郊铁炉庙。

4.延兴门内白居易宅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唐代著名诗人。贞元进士,在长安先后居住在永崇坊华阳观、常乐坊、宣平坊、昭国坊。元和十五年(820

年),迁居于延兴门内新昌坊。白居易《题新居寄元八》诗:“青龙冈北近西近,移入新居便泰然。”又《题新昌所居》诗:“宅小人烦闷,泥深马钝顽。街东闲处住,日午热时还。”

5.延兴门内姚合宅

姚合(775~854后),唐诗人。开成(836~840)末官至秘书监,曾先后在长安亲仁坊、常乐坊、新昌坊居住。其《新昌井》诗:“旧客常乐坊,井泉浊而咸。新屋新昌里,井泉清而甘。”新昌坊宅址在今西安东南郊铁炉庙。

6.延兴门附近为隋唐长安墓葬区

延兴门位于今西安城东南郊三兆之北,因地处都城东南隅,极为荒僻,早在隋唐时这里就成为都人的墓葬区。

首先,开皇二年(582年)隋文帝营建新都大兴城前期在清理新都基地时,将无主坟墓悉迁葬于延兴门附近。为了超度这些被迁葬的亡灵,特在延兴门西立一寺院,并取名灵感寺。“文帝移都,徙掘城中陵墓,葬之郊野,因置此寺,故以灵感为名。”(《唐两京城坊考·新昌坊》)这座寺院就是唐代易名的青龙寺。

其次,直到唐代,延兴门附近诸坊,因地处偏远,仍为都人的墓葬之地。唐李复言《续玄怪录》载,唐代时紧靠延兴门之南的“长安升道里,南街尽是墟墓,绝无人住”。

7.唐懿宗延兴门送葬同昌公主

同昌公主为唐懿宗长女,郭淑妃所生,深得懿宗宠爱,嫁宰相韦保衡。咸通十二年(871年)公主死,葬少陵原。送葬之日,“帝与妃坐延兴门,哭以过柩,仗卫弥数十里”(《新唐书·诸帝公主》)。



阎良新兴 特技唢呐

(富小云整理)

唢呐是一种古老的民间乐器，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民间比较兴盛，“文化大革命”期间，破四旧时曾一度销声匿迹。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又逐渐兴起，常用于表现大喜大悲的红白喜事、年节庆典等场合的表演，经过长期的历史传承和演变，唢呐出现了众多流派。关中唢呐受秦腔曲牌的影响较大，多用吹打，其内容甚为广博。

阎良区新兴街道办事处的民间艺人袁学民，自幼师承民间老艺人赵天禄等人学习唢呐技艺，后来凭借几十年的勤学苦练，把中国民族乐器——唢呐表演得出神入化。他不仅继承了传统的口吹演奏方式和口鼻同吹唢呐的绝技，而且独辟蹊径练就鼻吹唢呐、噙刀顶转的演奏绝技，并且将唢呐演奏与传统魔术相结合，边演奏边吐出几丈长的彩条来，精彩绝伦，令人叹为观止。他表演时的器具主要有八支音高各不相同的唢呐以及刀具、花瓶、彩条、彩盘、对联、砖头、气球等，并配以鼓、锣、钹等乐器。

特技唢呐一般需要3-4人配合表演，全部锦衣打扮，2-3人以鼓、钹、锣配合其演奏，

一人丑角装扮协助其特技表演。袁学民的特技唢呐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他的曲调时而欢快、含蓄、优雅，犹如含情脉脉的少女，时而高亢、激昂，穿透力强，似血气方刚的少年；他的表演时而口衔刀具顶砖，令人心惊胆战，时而口喷烈火令人热血沸腾，尤其是那口鼻同吹八支唢呐并且吹气球的技艺更是令人拍案叫绝。

2008年6月，阎良新兴特技唢呐入选西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清明节的由来与传说

我国传统的清明节大约始于周代，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清明最开始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气，清明一到，气温升高，正是春耕春种的大好时节，故有“清明前后，种瓜种豆”。“植树造林，莫过清明”的农谚。后来，由于清明与寒食的日子接近，而寒食是民间禁火扫墓的日子，渐渐的，寒食与清明就合二为一了，而寒食既成为清明的别称，也变成为清明时节的一个习俗，清明之日不动烟火，只吃凉的食品。

关于寒食，有这样一个传说：相传春秋战国时代，晋献公的妃子骊姬为了让自己的儿子奚齐继位，就设毒计谋害太子申生，申生被逼自杀。申生的弟弟重耳，为了躲避祸害，流亡出走。在流亡期间，重耳受尽了屈辱。原来跟着他一道出奔的臣子，大多陆陆续续地各奔出路去了。只剩下少数几个忠心耿耿的人，一直追随着他。其中一人叫介子推。有一次，重耳饿晕了过去。介子推为了救重耳，从自己腿上割下了一块肉，用火烤熟了就送给重耳吃。十九年后，重耳回国做了君主，就是著名春秋五霸之一晋文公。

晋文公执政后，对那些和他同甘共苦的臣子大加封赏，唯独忘了介子推。有人在晋文公面前为介子推叫屈。晋文公猛然忆起旧事，心中有愧，马上差人去请介子推上朝受赏封官。可是，差人去了几趟，介子推不来。晋文公只好亲去请。可是，当晋文公来到介子推家时，只见大门紧闭。介子推不愿见他，已经背着老母躲进了绵山（今山西介休县东南）。晋文公便让他的御林军上绵山搜索，没有找到。于是，有人出了个主意说，不如放火烧山，三面点火，留下一方，大火起时介子推会自己走出来的。晋文公乃下令举火烧山，孰料大火烧了三天三夜，大火熄灭后，终究不见介子推出来。上山一看，介子推母子俩抱着一棵烧焦的大柳树已经死了。晋文公望着介子推的尸体哭拜一阵，然后安葬遗体，发现介子推脊梁堵着个柳树树洞，洞里好像有什么东西。掏出一看，原来是片衣襟，上面题了一首血诗：

割肉奉君尽丹心，但愿主公常清明。
柳下作鬼终不见，强似伴君作谏臣。
倘若主公心有我，忆我之时常自省。
臣在九泉心无愧，勤政清明复清明。

晋文公将血书藏入袖中。然后把介子推和他的母亲分别安葬在那棵烧焦的大柳树下。为了纪念介子推，晋文公下令把绵山改为“介山”，在山上建立祠堂，并把放火烧山的这一天定为寒食节，晓谕全国，每年这天禁忌烟火，只吃寒食。

走时，他伐了一段烧焦的柳木，到宫中做了双木屐，每天望着它叹道：“悲哉足下。”“足下”是古人下级对上级或同辈之间相互尊敬的称呼，据说就是来源于此。

第二年，晋文公领着群臣，素服徒步登山祭奠，表示哀悼。行至坟前，只见那棵老柳树死树复活，绿枝千条，随风飘舞。晋文公望着复活的老柳树，像看见了介子推一样。他敬重地走到跟前，珍爱地掐了一下枝，编了一个圈儿戴在头上。祭扫后，晋文公把复活的老柳树

赐名为“清明柳”，又把这天定为清明节。

以后，晋文公常把血书袖在身边，作为鞭策自己执政的座右铭。他勤政清明，励精图治，把国家治理得很好。

此后，晋国的百姓得以安居乐业，对有功不居、不图富贵的介子推非常怀念。每逢他死的那天，大家禁止烟火来表示纪念。还用面粉和着枣泥，捏成燕子的模样，用杨柳条串起来，插在门上，召唤他的灵魂，这东西叫“之推燕”（介子推亦作介之推）。此后，寒食、清明成了全国百姓的隆重节日。每逢寒食，人们即不生火做饭，只吃冷食。在北方，老百姓只吃事先做好的冷食如枣饼、麦糕等；在南方，则多为青团和糯米糖藕。每届清明，人们把柳条编成圈儿戴在头上，把柳条枝插在房前屋后，以示怀念。

·名句欣赏·

【树德莫如滋，去疾莫如尽】——《左传·哀公元年》。

【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春秋谷梁传·僖公十五年》。

流：流传。光：犹言远。卑：犹言近。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载曾子语

夫子：先生，指孔子。

【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论语·子张》载子夏语

逾：超越。闲：栅栏，指界限。

【德不孤，必有邻】——《论语·里仁》载孔子语

意谓有德的人不会孤独，一定有人跟着他。



人们都知道陆游是南宋著名的诗人,但很少有人知道他还精通烹饪。在他的诗词中,咏叹佳肴的足足有上百首,还记述了当时吴中(今苏州)和四川等地的佳肴美饌,其中有不少是对于饮食的独到见解。

陆游的烹饪技艺很高,常常亲自下厨掌勺。一次,他就地取材,用竹笋、蕨菜和野鸡等物,烹制出一桌丰盛的佳宴,吃得宾客们“扞腹便便”,赞美不已。他对自己做的葱油面也很自负,认为味道可同神仙享用的“苏陀”(油酥)媲美。他还用白菜、萝卜、山芋、芋艿等家常菜蔬做甜羹,江浙一带居民争相仿效。

陆游在《洞庭春色》一诗中说,有“人间定无可意,怎换得玉脍丝莼”的句子,这“玉脍”指的就是隋炀帝誉为“东南佳味”的“金齏玉脍”。“脍”是切成薄的鱼片;“齏”就是切碎了腌菜或酱菜,也引申为“细碎”。“金齏玉脍”

就是以霜的后白色的鲈鱼为主料,拌以切细了的色泽金黄的花叶菜。“丝莼”则是用莼花丝做成的莼羹,也是吴地名菜。陆游在诗中称赞的这些菜肴,在当时确实都是名菜。

陆游,是一位不亚于苏东坡的业余烹饪大师。在他的诗词中,咏吟烹饪的有上百首。例如记录他会做饭(面)菜(羹)的诗句就有“天上苏陀供,悬知未易同”即是说自己用葱油做成的面条是天上苏陀(即酥)一样。他在《山居食每不肉戏作》的序言中记下了“甜羹”的做法:“以菘菜、山药、芋、菜菔杂为之,不施醢酱,山庖珍烹也。”并诗曰:“老住湖边一把茅,时话村酒具山肴。年来传得甜羹法,更为吴酸作解嘲。”陆游是很会烹饪,又爱烹饪的。

正是因为陆游欣赏这些家乡名菜名点,所以当他宦游蜀地之时,不时要通过怀念家乡菜点来抒发他的恋乡之情,写出了“十年流

落忆南烹”句。

陆游不但会做,而且很懂得烹调技术。他长期在四川为官,对川菜兴味浓厚。唐安的薏米,新津的韭黄,彭山的烧鳖,成都的蒸鸡,新都的蔬菜,都给他留下了难忘的印象,离蜀多年后还念念不忘。晚年曾在《蔬食戏作》中咏出“还吴此味那复有”的动情诗句,在《饭罢戏作》一诗中,他说:“东门买彘骨,醢酱点橙薤。蒸鸡最知名,美不数鱼鳖。”“彘”即“猪”,“彘骨”是猪排。排骨用加有橙薤等香料拌和的酸酱烹制或蘸美至极。此外在诗中称道了四川的韭黄、粽子、甲鱼羹等食品。

陆游在选用新鲜的优质烹饪原料时写道:“霜余蔬甲淡中甜,春近录苗嫩不葢。采掇归来便堪煮,半铢盐酪不须添。”他总结了选取用蔬菜不要调味,吃起来也很新鲜。并强调了新鲜原料一面来计是对的;但从“半铢盐酪不须添”之句来看,又有点走向另一个极端,他否定了盐(主味)应有的作用,过于强调“本味”也是不足取的。

陆游到了晚年,基本吃素,他认为吃既节俭,又可养生。他喜爱的素菜有白菜、芥菜、芹菜、香蕈、竹笋、枸杞叶、菰、豆腐、茄子、荠菜等。还自亲种菜,而且几乎与荤菜绝了缘。同时还亲自谓所以这样节约,“不为休官须惜费”,而是“从来简俭是家风”。何况“邻家稗饭亦常无”,自己这样吃蔬食,也可“使胸中无愧作,一餐美敌紫驼峰”。尤其嗜食荠菜,常常吃得不

肯罢休。他对荠菜的做法也很讲究,主张采来便煮,确保新鲜,不加盐酪,突出真味。在评价薏米时,有诗句云:“初游唐安饭薏米,炊成不减雕胡美。大如芡实白如玉,滑欲流匙香满屋。”把大如芡实(鸡头肉)的薏米的白、滑、香的特点都写得非常生动。

陆游又认为吃粥可以强身益气,延年益寿,他在《食粥》诗中写道:“世人个个学长年,不悟长年在目前。我得宛丘(仙人)平易法,只将食粥致神仙。”他之所以能够活到八十多高龄,恐怕同他吃粥与晚年基本吃素有一定的关系。

陆游还提倡乡土风味,如“鲈肥菰脆调羹美,芥熟油新作饼香。自古达人轻富贵,倒缘乡味忆回乡。”又如“祖国山河无限好,家乡父老不患贫。淡云出岫发何日,也味争如乡味醇。”这是有一定的道理。可见,陆游是位美食兼诗文的烹饪学者。



清代落第举人的另一出路——大挑

大挑是清代特有的一种选官制度，其基本内容是，在多次参加会试落榜的举人中，选拔一些人出来做官，一等作为地方知县候补试用，二等则作为各级各类学校的教职人员任用。

近代以前，科举是读书人的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出路，但科举取士，人数毕竟十分有限，大批的落榜考生找不到出路，“仕途淹滞”，心存不满，有时也会成为一种社会问题。雍正时期，政府就开始采取措施，解决落榜生出路。雍正二年秋，针对一些边远省份基层县官出缺后，部选官员一时难以派送到任，而署理官员“屡易其官”，“貽误地方”的情况，由雍正帝提议，吏部议定：进京会试落第的各省举人，由同乡的京官出具担保，吏部挑选引见于皇帝，然后发往云贵川广等远方省份，专门在官员出缺时担任“署理”县官，表现好的可以由督抚保举，实授补用（《清世宗宪皇帝实录》卷22）。这是清代第一次尝试从落第举子中选拔官吏。至雍正五年（1727年）三月，以“向来各省县令，多循资按次，照例选用之员，故其中庸碌无能者有之、年力衰惫者有之、少不更事者有之。以致苟且因循，贪位窃禄，诸事闒冗，职掌废弛”。下令：“今因会试后，天下举子齐集京师。朕思其中必有才品兼优之士，是以特加遴选，畀以县令之任。”期望这些举子们不仅能“办理刑名，征收赋税”，而且“必须实尽父母斯民之道”（《清世宗宪皇帝实录》卷

55）。四月，又下令挑选部分落第举子，分派各地担任教谕、训导等教职。但雍正时期，对于落第举人挑选任用，尚未形成固定的制度。

到乾隆时期，落第举人选用为官开始形成制度，称为“大挑”。

清人陈康祺说清代的大挑制度，始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举人大挑，始于乾隆丙戌科。”有误。大挑之制实始于乾隆十七年（1752年，壬申恩科），是年，万寿恩科，乾隆帝发布谕旨：“今岁万寿恩科，各省计偕（指举人赴会试）云集，而中额例有定数。其下第举子中，有年力才具可以及时录用者，特予格外加恩，拣选引见，分别以知县试用，教职铨补，俾得早列仕版。”（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三五三《礼部贡举》）其数额标准，大省落第举子中选四十人，中省三十人，小省二十人，由乾隆帝亲自接见，从中选取一部分分任知县或教官，对于其中年过七十者，加恩给衔，令其回乡养老。是为大挑制度原起。

乾隆三十年，再颁上谕，“念举人需次知县，动至三十年，应筹所以疏通壅滞之法。”命令从次年起（1766年）会试以后，除近两科刚刚考中举人者外，两科以前的举人，年龄不大，精力尚好又情愿出来做官的，由地方督抚给文赴部候选，到京后由皇帝派大员从中挑选，皇帝钦定，选择一部分出仕为官。年龄七十以上的，则分别恩赏中书科中书、大理寺评事、太常寺博士三项职衔。次年，即乾隆三十

一年，“挑取一等八百余人，以知县等官分发试用，二等一千一百余人，以教职铨选，未入选之年七十以上者，即给与中书等项职衔。”《清朝通志·选举略二》卷七十三）此后，每六年（两科）举行一次。在拣选名额的分配上力图公平。起初以省份大小决定人数，按照举人的省份远近定人数多寡名额，向边远省份倾斜，以照顾路远的士子。后来发现，边远省份，举人数量本来较少，内地大省举人较多，以省为单位挑选，仍有失公平，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下令，从下次开始，“无论远近，但就人数多寡，均匀挑取，俾远近士子均得乘时自效，以示朕加惠寒畯之至意。”（《清朝文献通考·选举考六》卷五十二）嘉庆十八年（1813年）后，因分发各省落第举人增多，造成候补官员过多，补缺无期，改为每四科（12年）举行一次。

起初，所有选中者均经皇帝亲自接见，后由于为数过多，改为皇帝只分批召见其中列入一等部分。直到清末，这一办法仍然保留，道光时参加大挑的举人段光清记录说“一等须至圆明园引见”。经过皇上钦选这一关后，这些举人们就有了做官的资格，一般分派各省作为七品及其以下基层官员候补或直接任用。“一等用知县者，又借补府经历，直隶州州同、州判，属州州同、州判，县丞，盐大使，藩库大使，凡九班；二等以学正、教谕用，借补训导，凡三班。时谓之九流三教。”（清·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卷12，中华书局，1984年3月版544页）个别情况下，有另选其他部门作用的，如段光清于道光二十四年进京参加大挑，得一等，选为浙江候补知县，与之同列一等的

被“挑选河工人员数十名”。作为个案，也有作为六品以上官员任用的情况，如嘉庆时贵州举人高廷瑶，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中举，参加嘉庆六年（1801年）大挑，得二等，他曾参与抚定当地苗族反抗，得到过六品顶戴，特奉谕旨，加一级以六品实职通判任用。“大挑例用知县，得通判者，太守一人而已。”此人“后历仕安徽、广东、广西等地，俱著声绩”。（清·陈康祺《郎潜纪闻四笔》卷2，中华书局，1990年3月版28页）

大挑之中，也有趣事：乾隆间，常州有个叫恽敷举人参与大挑，某大臣监挑，读到他的名字时，把恽（音：运）字读成了挥，这个恽敷不懂官场规矩，也不知道给大臣留面子，当场大声纠正，说大臣把名字读错了。这位大臣当场有些下不来台，心想，大庭广众之下，这人也帮不着打个掩护，于是把恽敷屏斥不用。若干年后，恽敷再次进京参与大挑，这次遇上了个明白官，看到他姓恽，大喜：“这可是南田先生后人啊。”马上把他列为一等。原来，清初有个大书法家名恽南田，其诗、书、画称为“三绝”，其“没骨画”开创了常州画派，也是常州人，这个恽敷还真说不定就是恽氏之后呢。得祖上恩荫，恽敷终于得以授官。而同为王公大臣，其处事雅俗区别也真有天差地别。（清·陈康祺《郎潜纪闻三笔》卷6，中华书局，1984年3月版755页）

嘉庆六年，按例举行大挑。这一年，京畿地区久旱不雨，嘉庆帝很是着急，盼望着早点下一场大雨，事出凑巧，大挑这一天，果然下了场大雨。嘉庆帝喜极，下令，所有这天参加大挑取得一等者，每人赏葛纱一匹。也算是

大挑中的一桩逸闻。(清·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卷16,中华书局,1984年3月版624页)

嘉、道之后,鸦片开始在中国泛滥成灾,屡禁难止。道光间竟然有进京大挑的举人们也公然携带大烟进京,为路人所笑。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时值第一、二次鸦片战争之间,鸦片成为利润很大的商品。这一年,安徽的一帮举人们进京参加大挑,段光清记录说,时值大挑之年,进京应试的,参加大挑的举人老爷们正月里就出发了,一路同行的人很多。走到庐州凉镇,这里有个大烟庄,近年来贩烟进京,利润很大。于是举人们都把盘缠拿出来贩烟,图的是到京后得点利,以增加盘缠。因为举人们是有身份的人,路上关卡对他们是不盘查的,所以这帮人大包小包地带了不少大烟。路上,有道旁观看的人说:我还以为是进京赶考的老爷,原来是一伙贩烟的客人耳。段光清听了,心中很不是滋味,对同行的人说,我们这些人一举一动都有人盯着的。(清·段光清《镜湖自撰年谱》道光二十四年,中华书局,1960年2月版,第6页)后来,这帮临时烟贩的大烟在京郊关卡上果然遇到点小麻烦,还亏得段光清为人精明,总算交了税了事。

大挑所选官员,主要是为了找些能办事的基层官员,所以其选择的主要标准有两条,一为年富力强,既不能太年轻,也不能太老。嘉庆帝曾表示:“一等为州县求父母,二等为学官取师长,年太轻恐不晓事,年太老恐不任事,先取强壮,后取人品。”(清·段光清《镜湖自撰年谱》道光二十四年,中华书局,1960年

2月版,第7页)二为人品,这里的所谓人品,主要是面相上要看得过去,当地方官,尤其是基层“父母官”,长相真不能太丑。清代的科举取士制度中,从来就有以貌取人的情况,而大挑则是其中唯一的、公开以貌取人的一项。大挑取士,“重在形貌与应对”,就是说主要要看长相好不好,会不会说话。嘉庆帝、道光帝都曾公开表示过这一点。

相传,大挑时,具体承办挑选之事的大臣们,有八个字的取舍原则:同田贯日身甲气由,都是用汉字的字形来说明人的长相。前四字,同字指长方脸型;田字指方脸;贯,就是头大身直体长;日,就是长短肥瘦都适中,又站得端直。一个人能够达到这样的标准,基本上就有希望进入大挑一等了。反之,如果是后四个字,就没什么希望了:身,指体斜不正;甲,明显是大头小身体;气,就是单肩高耸;由,就是小头大身体。相貌成了这个样子,时人认为是不适合做地方官的。因为要挑的人太多,一般官员们初选时并不问话,只是由人唱名时,被选者高声应答一句,能够进入一等的,主要靠长相。待皇帝召见时,偶有问话,也只是回答一两句而已。因此,相貌是否端正,成为大挑一等的主要标准。

其实,在科举考试的起点上,地方上院试时,就有以貌取人的例子。曾有湖北一个姓李的官员到浙江当学政,他不喜欢长文章,好取短篇。更有一好,考生凡长得“美秀”者,就列为头等,相貌长得不大好看,丑一点的,虽然文章已经入选,肯定要在文中找点毛病,把他去除了事。当地有歌谣说:“文宜浅淡干枯短,人忌胡麻胖黑长。”

一、“获悉”二数字化尴尬

1971年7月9日至11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周恩来总理与基辛格进行了多次会谈。10日晚，双方就此次基辛格秘密访华的联合公告问题进行了商谈。联合公告如何措词，双方出现了争议，其中一处是尼克松来华访问是谁主动提出来的。中方在起草原稿时，说明是尼克松主动提出要求，由中国邀请。基辛格提出异议，说这样写让人看了觉得尼克松总统像个旅游者，美方不能接受。这一点说到底是个“面子”问题。周恩来充分考虑到尼克松面子，将原稿改成中方“获悉”尼克松要来访，由周恩来邀请。仅仅“获悉”二字的改动，解决了使大家为难的问题。双方都对这一修改拍手称妙。拿到修改后的公告稿，基辛格非常满意，他清楚，中方已经设身处地考虑了美方意见。因此，他干脆在“接受邀请”前加上了“愉快地”几个字。1971年7月16日，中美双方同时发表了一则内容相同的公告：“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于1971年7月9日至11日在北京进行了会谈。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



周恩来 “咬文嚼字”二三事

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邀请。……”

二、“麻烦”一词起风波

1972年9月25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的专机徐徐降落在北京机场。当晚，周恩来专门设宴招待田中角荣一行，并发表了意义深远的祝酒词。兴奋中的田中角荣首相站起来，作了一篇答词。但答词中有一处明显不妥，他说：“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的麻烦。对此，我再次表示深刻的反省。”

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损失，何止是“麻烦”？这种轻描淡写的词语引起了中方的强烈不满。在以后的会谈中周恩来



立场坚定地提出了这一问题。他说：“田中首相表示对过去的过程感到遗憾，并表示要深深地反省，这是我们能够接受的。但是‘添了很大的麻烦’这一句话，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感。因为普通的事情也可以说是‘添麻烦’，‘麻烦’在汉语里意思很轻。”

田中角荣解释道：“可能是日文和中文的表达不一样。从日文来说，‘添麻烦’是诚心诚意地表示谢罪之意，而且包含着保证以后不重犯，请求原谅的意思。”他还表示：“如果这样的表达不合适，可以按中方的习惯改。”周恩来对这种知错就改的诚恳态度表示欢迎。文字表述的准确性，是周恩来工作中的一贯要求。

三、对“重要”“指示”“接见”说“不”

周恩来有一次做形势报告，国内、国外讲

了一个下午，讲的内容非常重要。记者采写时稿子上有一句“周恩来总理做了重要讲话”，交给他本人审阅时，别的地方都没改动，他就把那个“重要”二字圈掉了。有一次开座谈会，大家发言完了，主持会议的人说：“现在请周总理作指示。”他说：“不是，不是‘指示’，我个人发言就是个人意见。我今天这个发言并不是中央通过了，可能对，也可能不对。我说错了，大家可以批评。”还有一次，他会见外宾，新闻稿中写的是：“周恩来总理今天接见了……”他把记者找过去，说：“不要用这个‘接见’，应该用‘会见’。”“中国封建社会时代，皇帝老子都是接见外国大臣，接见下属官员。他是高高在上，老子天下第一。他接见你，你是在下面，他是在上面。这也是一种封建观念。我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总理，不管会见什么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处在平等的地位。所以你们要用‘会见’，不要用‘接见’。”

四、否认“神采奕奕”

1961年，周恩来总理出访归来，第二天在报纸上就有消息说“周总理神采奕奕地走下飞机”。看到报道，周恩来叫值班秘书把记者找来，指着报纸上的消息说：“现在国家遭难，人民受苦，我周恩来凭什么还‘神采奕奕’？”他还说，我们共产党的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现在，天灾人祸搞得我们连饭也吃不饱，我周恩来作为国家总管，居然还“神采奕奕”！这样宣传“上不合乎国情，下不安于民心”。

周恩来总理咬文嚼字，体现了他求真务实、严于律己、严谨缜密的工作作风。



隋炀帝的『节会』政治

隋炀帝杨广崇尚奢靡，每天的生活都像过“节”一样，而且极好面子，特别爱办节会活动，并每每把节会办成了给自己争面子、树形象的政治“庆典”。

大业二年(606年)正月，突厥启民可汗“访问”大隋，隋炀帝觉得有必要开个“节会”，给自己争争面子，让客人开开眼界。于是，他下诏把散落各地的原来周、齐、梁、陈等国的乐人重新召集起来。等客人一到，隋炀帝便陪启民可汗在芳华苑积翠池旁检阅散乐。接着，随着鼓声一响，一队巨大的舍利怪兽跳跃而出，激水满大厅，水人、虫鱼、龙龟等伶人装扮的杂耍队塞满大厅。正当客人张大嘴巴看得入迷时，又见巨大的鲸鱼模型向天喷出雾烟，转瞬之间，浓烟里又冒出数条黄龙，长七八丈，紧接着又有神龟驮山，幻人吐火，千变万化，无奇不有，直看得客人目眩眼迷。大业六年

(610年)正月十五，为欢迎西域诸胡、突厥、蕃人等酋长“来访”，隋炀帝决定办一场盛大的“节会”，让酋长们切身感受大隋朝的盛世繁华，让“国际友人”共享大隋朝的发展成果。于是，他安排在东都洛阳端门街大演百戏，戏场周围长5000步，有18000人奏乐，乐声传播数十里，从黄昏到天明，灯火煌煌，辉映天地，整整狂欢了一个月才结束。与此同时，为了把这一“节会”做大做强，更加突出其深远的政治意义，隋炀帝下

令对各蕃部落酋长到达的洛阳丰都市场进行“高起点”规划，“高标准”整修装饰，屋檐式样统一，帷帐华丽，珍宝充溢，要求进入市场的人都要穿得体面华贵，卖菜的人要坐在用龙须编织的席子上。又下令市肆酒楼，胡人客商吃饭喝酒不要钱，吃完后，还要对这些“外宾”宣传：“中国丰饶，酒食例不取值。”硬生生地让“外宾”惊叹不已。隋炀帝还命人用绢帛(高级绸缎)缠树，对客人说这是“仙晨帝所”。在如愿所偿地获得“国际友人”的“盛赞”后，隋炀帝觉得自己捞足了面子，实现了“节会”的政治目的，便决定以后每年正月都要在洛阳端门街狂欢，举办例行的“欢庆节”。咱们中国人的“闹元宵”，自汉代始，至隋代大为传扬。

特别意味深长的是，隋炀帝不仅善于在“国际友人”面前大操大办“节会”活动，来给自己争面子、树形象，而且敢于把国内视察和

●文史拾趣●

对外征战颇有“创意”地当成“节会”来操办，来向自己的国民和敌人“全方位”地展示“辉煌”的建设成就和“雄厚”的综合国力。炀帝曾三次乘龙舟沿运河巡视南方。他不仅要求把龙舟建造得巍峨、漂亮，而且他乘坐的龙舟有4层，高45尺，长200丈，最上一层有正殿、内殿、东西朝堂，中二层有120房，全部用金玉装饰，耀人眼目，而且规定挽船的80000多名民工都穿锦绣华丽的衣服，做到整齐好看。他每次出巡，船舟连绵200余里，风帆劲扬，照耀水陆，两岸则有骑兵夹岸护送，同样连绵200余里，旌旗猎猎，马蹄声声。路过的州县500里以内都要献食，极尽水陆珍奇，没有吃完的就地弃埋。大业八年(公元612年)，隋炀帝第一次征伐高丽。左右各12军，113.38万

人，号称200万，那些运送军需品的役夫近300万人。日遣一军，相去40里，连营渐进，用了48天才发完兵，隋军首尾相连，鼓角相闻，旌旗连绵不断，长达960里，仅御营就有12卫、3台、5省、9寺，绵延80里。如此盛大出兵规模，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然而，隋炀帝大操大办“节会”之后，却办光了国库，办失了人心，办来了民变。最后，宇文化及带领禁卫军在江都哗变，要砍死炀帝。但死到临头的炀帝竟然不忘给自己操办他人生中最后一场有面子有气派的“节会”活动，他凛然道：“天子死自有法，何得加以锋刃！取鸩酒来！”但一时找不到毒药，他便自己解下练巾交给哗变士兵，让士兵用练巾绞死自己。

·知识窗·

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来历

1886年5月1日，芝加哥的20多万工人为争取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而斗争，终于获得了胜利。为纪念这次工人运动，1889年7月14日，由各国马克思主义者召集的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在法国巴黎隆重开幕。大会上，与会代表一致同意：把5月1日定为国际无产阶级的共同节日。

这一决议得到世界各国工人的积极响应。1890年5月1日，欧美各国的工人阶级率先走上街头争取合法权益。从此，每逢这一天世界各国的劳动人民都要庆祝。

第二轮西安市志编纂工作业务培训会召开

按照西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调整第二轮修志进度的通知要求,2012年要完成第二轮西安市志初稿撰写任务。围绕本年度市志编纂工作的中心任务,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于3月27—29日举办第二轮西安市志编纂业务培训会。全市101家市志承编单位的修志主编、主笔等140余人参加了培训。

本次培训会是我市启动第二轮市志编纂工作以来举办的第四次全市性集中培训,旨在提高修志人员业务素质,规范初稿编纂、提升初稿质量。会议就志书初稿撰写、人物志资料搜集及编纂有关问题、志书行文规范及西安市地情资料数据库的使用等4个专题进行辅导并组织了人物资料编纂工作研讨会。在4个专题的辅导中,市志初稿撰写辅导主要围绕目前送报初稿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和修志人员在撰稿过程中遇到的难题,从撰写前的准备工作、撰写要求、应把握的原则和应注意的

几个问题四个方面讲解;人物志编撰辅导主要围绕人物入志的重要性、人物的收录范围及提高人物志的编纂质量三个方面展开;行文规范细则解读以行文中常见词语表述与病例剖析为主,归纳整理为18方面的问题,

逐一举例分析对比;另外,针对部分修志人员对“西安市地情资料数据库”不熟悉、在查阅、使用首轮《西安市志》及《西安年鉴》等志鉴资料时遇到困难的实际,会议还安排了“西安市地情资料数据库”资源介绍及检索系统操作演示环节,受得了参会人员的普遍欢迎。会议还专门召集人物志主要承编单位对人物志编纂工作的有关问题进行了研讨,为尽快落实人物志资料搜集及编纂任务奠定了基础。

此次培训会由市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第二轮市志执行副主编张帆主持并做培训动员和总结。在培训动员中,张帆同志向与会人员通报了第二轮西安市志的编纂工作进展情况,肯定了全市多数承编单位的修志工作成绩,认为多数承编单位领导重视,选配人员得力,工作条件到位,推进工作扎实有效。同时,对工作滞后、没有按照要求完成资料收集和报送资料长编的单位提出批评。在培训总结中,张帆同志充分肯定了全体与会人员在本次培训中所表现出的良好的学习风气和协作精神,并对做好下一步的工作提出两点建议。一是希望全体修志同仁学会主动工作。要学会在实际工作中主动争取领导的支持,主动开展工作,主动与市志办相关责编组取得联系。二是鼓励新参加修志工作的年轻同志学会快乐工作。要在实际工作中保持好的心态和好的状态,善于在清苦、寂寞、重压中寻找快乐,善于在率真、无欲、勤奋中体会快乐。最后,张主任重申了市政府对各承编单位二轮修志工作的进度要求,希望各承编单位特别是工作滞后的单位要充分认识修志任务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寻找差距,调整方案,加快进度,确保此项工作在全市范围内齐头并进。

《西安市志·人物志(1991—2010)》 资料搜集工作研讨会召开

2012年3月28日,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利用第二轮西安市志编纂工作业务培训会召开之际,组织召开了《西安市志·人物志(1991—2010)》资料搜集工作研讨会。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第二轮西安市志执行副总编张帆主持会议。西安市委办公厅、市人大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市政协办公厅、市中级人民法院、市公安局、西安警备区、市委统战部、市总工会、市科技局、市卫生局、市公安局、市民政局、市民委及各区县等30余家承编单位、40余名主编、主笔参加了会议。

会议对人物志资料搜集及编纂组织工作进行了研讨,就人物的人选标准和范围,人物资料的搜集与组稿方式、编纂任务的划分等问题基本达成一致意见。考虑到人物入志的敏感性和关注度,人物志编纂工作拟定按照

三步走的方式进行。第一步,各承编单位于四月底前作好预选入志人物的摸底和基本信息报送;第二步,市志总编室根据各承编单位报送的预选入志人物基础资料进行筛选,确定入志人物名单并报市志编委会审定,之后将任务细分并反馈给各有关单位,由责任单位进行资料补充及人物志初稿编纂;第三步,市志总编室组成专门的人物志项目组,对各单位报送的人物志初稿进行修改、返稿、审定,撰写概述,做好拾漏补遗等工作,完成人物志总纂。

为了提高各承编单位和修志人员对人物志编纂工作的重视程度和编纂业务能力,在本次人物志研讨会之前,市志办还邀请市文史馆前副馆长、市志办前副主任、第二轮西安市志总编室顾问蒋纪新就人物志编撰工作进行了专题辅导。

(上接第47页)村镇、社区、校园、企业、家庭文化建设和文化进万家系列活动”精神,以现代科技手段拓展年鉴工作领域,推动西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积极举措和有益尝试。“年鉴进万家活动”只是市方志办计划开展的“志书进万家活动”的一个序幕,以后将不断丰富

和延伸活动内容,力争使各种地情资料书都能够走进千家万户,让广大市民免费阅读使用。通过“志书进万家活动”,使广大市民“读志书,知市情,爱西安”,进一步增强西安市民的荣誉感和责任感,为建设具有历史文化特色的国际化大都市作出应有的贡献。



被误传了几千年的俚语

1、“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原为“嫁乞随乞,嫁叟随叟”意思,是一个女人即使嫁给乞丐或者是年龄大的人也要随其生活一辈子。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一俗语转音成“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了。

2、“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

“皮匠”实际上是“裨将”的谐音,“裨将”在古代是指“副将”,原意是指三个副将的智慧合起来能顶一个诸葛亮。流传中,人们将“裨将”说成了“皮匠”。

3、“不见棺材不落泪”

本是“不见亲棺不落泪”,并不是见了任何棺材都落泪。后来,讹变为“不见棺材不落泪”。

4、“有眼不识金镶玉”

本是“有眼不识荆山玉”。荆,指古代楚国;“荆山玉”,是玉匠在荆山发现的玉。

5、“不到黄河心不死”

本是“不到乌江心不死”。乌江,项羽自刎的地方。后来,乌江讹变成黄河。

6、“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

本是“舍不得鞋子套不住狼”。意思是要打到狼,就要不怕跑路,不怕费鞋。不过这个还能将就理解,因为四川那边管鞋子叫孩子。

7、“狗屁不通”

这个成语最初是“狗皮不通”。狗的表皮没有汗腺,酷夏,狗要借助舌头来散发体内的燥热。“狗皮不通”就是指狗的这个身体特点。

8、“王八蛋”

这是民间的一句骂人话。实际上,这句话的原来面目是“忘八端”。古代“八端”是指“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此八端指的是做人之根本,忘记了这“八端”也就是忘了基本的做人根本,可是后来却被讹变成“王八蛋”!

东汉时买个官来当花多少钱

汉代的卖官鬻爵始于惠帝六年(前 189 年),到了东汉灵帝刘宏时,就把卖官鬻爵一事发挥到了极致。他把本就不多的国库吃光后,开始公开出售官职。尝到甜头后,又别出心裁地设置了一个买卖官职的交易所,以官的大小和任职地的好坏确定官价的高低。三公九卿等要职,也一律明码标价,公开出售。除了皇帝的位置不卖,什么都能卖。如果买的人多,竞争激烈,则投标竞价,价高者得。

官位的标价,则是以官吏的年俸来计算的。如年俸二千石的官位,标价就是两千万钱,年俸四百石的官位,标价就是四百万钱。

那么,年俸二千石的官是多大的官呢?当时的州牧是两千石的俸禄,郡守也是两千石待遇,县令享受六百石至一千石不等的俸禄。

由此看来,在当时就是做个县令也至少得花上六百万钱。若换算成人民币,大约汉时的 2 文钱,相当于现在的 1 元人民币。那么,县长一职,价值也就是人民币三到五百万。

那些不惜费血本花重金去买官做的人,心里头绝对不会去想什么为政清廉,造福一方的。投资就想要有回报,他们为了捞回本钱,只能是变本加厉的去搜刮、盘剥百姓,不择手段的榨取更多的金钱,之后再去买更大的官做,形成恶性循环。

为什么古人把路费叫做盘缠

盘缠是盘川的另一说法,意思是路费、游资,所以又叫川资。

“盘缠”是指如今说的旅费。但是,旅费为什么又“盘”又“缠”呢?盘绕、缠绕是近义词,钱同盘绕、缠绕在今日当然毫无关系,不过,古代却有某种必然联系呢!古钱是中间有孔的金属硬币,常用绳索将一千个钱币成串再吊起来,穿钱的绳索叫做“贯”,所以,一千钱又叫一吊钱或一贯钱。有出戏叫《十五贯》,即涉及十五串钱的一个案子。古时不要说没有旅行支票、信用卡,就算纸币也是后来才有的,于是,人们在出远门办事探亲之时,只能



带上笨重的成串铜钱。把铜钱盘起来缠绕腰间,既方便携带又安全,因此古人将这又“盘”又“缠”的旅费叫“盘缠”了。

盘缠准确的含义是路费,可路费的形式五花八门。富人出门远游带黄金白银,穷人的盘缠则可能只是几个饽饽或面饼。

在中国任职时间最长的外国人

日本人阿倍仲麻吕(698~770年)是古代在中国任职时间最长的外国人。阿倍仲麻吕自幼聪敏好学,18岁被选为遣唐留学生。717年,阿倍等500多名留学生和留学僧,不畏惊涛骇浪,乘船来到开元盛世的唐代京城长安,学习先进的唐代文化。这批人学成归国后,为传播唐代文化做了积极的贡献。阿倍仲麻吕才华出众,学习成绩名列前茅,从长安太学毕业后,参加唐朝的科举考试,金榜题名,中了进士。后来,阿倍改名晁衡留在唐朝任职,任从三品秘书监兼卫尉卿。他为中日文化交流做了大量工作。那时,来唐的日本遣唐使和留学生到阿倍住处求教者络绎不绝,阿倍一一予以亲切照顾。753年,年过半百的阿倍回国,玄

宗允其所请并任命他为唐朝使臣回访日本。可惜这次中途遇暴风,九死一生才返回长安。玄宗之后,阿倍继续在肃宗、代宗两朝任职,历任镇南都护、光禄大夫,左散骑常侍、御史中丞、北海郡开国公等要职。阿倍不仅是出色的行政官员,而且精通中国的诗词歌赋,是知名的文学家和诗人。他和李白、王维、储光羲、包佶、赵骅等诗人因诗结为莫逆。770年,阿倍仲麻吕终老于长安,在中国任职长达50年之久。



“买春”一词出现于唐代,其本意是“买酒”的意思。晚唐诗论家司空图所著《二十四诗品》一书,在“典雅”条目下列出了以下

堪称“典雅”的诗境:“玉壶买春,赏雨茅屋,坐中佳士,左右修竹。白云初晴,幽鸟相逐,眠琴绿阴,上有飞瀑。落花无言,人淡如菊,书之岁华,其日可读。”关于“玉壶买春”,现代语言学家郭绍虞先生解释如下:“春有二解:《诗品注释》:春,酒也。唐《国史补》:酒有郢之‘富水春’,乌程之‘若下春’,荥阳之‘上窟春’,富平之‘石东春’,剑南之‘烧春’。

此一义也。杨廷芝《诗品浅解》:春,春景。此言载酒游春,春光悉为我得,则直以为买耳。孔平仲诗:‘买住青春费几钱。’杨万里诗:‘种柳坚堤非买春。’此又一义也。窃以为二说皆通。”除了这两个义项之外,“买春”还有两个义项,其一为“买春钱”,指科举考试时亲友给落选者提供的酒食费。晚唐冯贽所著《云仙杂记》载:“进士不第者,亲知供酒肉费,号买春钱。”其二指清代春天的一种娱乐游戏,是社戏的表演场景,非常生动。“买春”这个优雅的古词汇,竟然被现代人化用为嫖娼,不知道是今人的悲哀还是古人的悲哀。

古代“宅女” 超龄不嫁会被罚款

古代女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那才是真正的“宅女”。按今天男女婚恋的“纯自然”状态,如果没有家国的干预,岂不是要老死闺中?

在古代,男婚女嫁不仅关乎人们的生理需求和社会稳定,更关乎人口的繁衍和家国的持续发展。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历代以媒人牵线、家长包办促成男女成婚的方式是主流。男女婚嫁既然是家国大事,政府也就往往会进行干预,出些“奇招”。

“奇招”有哪些呢?一是制定法令。越王勾践命令男子 20 岁而娶,女子 17 岁而嫁;宋仁宗时期让男子 15 岁而娶,女子 13 岁而嫁;明太祖规定男子 16 岁而娶,女子 14 岁而嫁;按《大清通律》,男的 16 岁而娶,女的 14 岁嫁人。二是处罚。到了法定年龄不嫁人的女子,那是要罚款的,譬如,汉朝孝惠皇帝时,谁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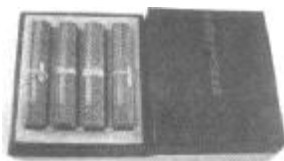


要有女儿 15 岁以上至 30 岁还没有嫁人,罚款 600 钱;唐代对于男子 20 岁以上,女孩 15 岁以上还没有配对结婚的也要处罚。

帝王为何如此积极地要求适婚男女及时成家呢?你想,适龄男女都不急着结婚生小孩,人丁缺乏,生产和戍边靠谁啊?你不急,皇帝急!而且,古代一直就认为“男有室女有家”后,阴阳调和了,人心才安然,社会才稳定和谐!

丛书,又称丛刊、丛刻、汇刻书、套书,是把各种单独的著作汇集起来,并冠以总书名的一套书。其形式分为综合性的丛书和专门性的丛书两种。在古代,丛书多为综合性的丛书。随着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各种专门性的丛书相继出现。

丛书之名起于唐朝陆龟蒙的《笠泽丛书》,但这实际上只是个人的文集,而不是丛书。中国丛书的刊刻,学者们一般认为始于南宋,俞鼎孙、俞经的《儒学警语》可算为丛书的鼻祖,该书成于南宋嘉泰二年(1202),一直到 1922 年经陶湘刊印,才为世人所知。该书共收



乾隆写本《钦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

什么是 丛书

录了六部宋代人的著作。以后各代多有编纂,比较有名的丛书如《四库全书》、《四部丛刊》、《四部备要》等。其中《四库全书》的规模之大,堪称中国古代丛书之最,共收书三千五百零三种,七万九千三百三十七卷,约九亿九千七百万字。当时,《四库全书》没有刻印,全书只缮写七部,分藏于清代的七大藏书阁。

“万岁”的来历

“万岁”本意有永远存在之意，本为臣下对君主的祝贺之辞。《事物纪原》卷一：“战国时，秦王见蔺相如奉璧，田单伪约降燕，冯谖焚孟尝君债券，左右及民皆呼万岁。盖七国时，众所喜庆于君者，皆呼万岁。秦汉以来，臣下对见于君，拜恩庆贺，率以为常。”今亦用为祝颂词，表达极其赞赏的感情用语口号。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可是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万岁”一词是最高统治者的代名词。臣子口中的“万岁爷”就是皇帝。除了皇帝，谁也不敢将自己与“万岁”联系起来，就连明朝权倾朝野的大宦官魏

忠贤，虽然从不把皇帝放在眼中，也只敢以“九千岁”自居。

在西周到汉初，“万岁”只是一种欢呼语。这一时期，“万岁”还有另一种意思，即作为“死”的讳称。《史记·高祖本纪》：“吾虽都关中，万岁后吾魂魄犹乐思沛。”

而皇帝被称为“万岁”，是始于汉武帝时的。武帝独尊儒术，“万岁”也被儒家定于皇帝一人。稽诸史籍，《汉书·武帝纪》载，元封元年春正月，武帝行幸缙氏。诏曰：“朕用事华山，至于中岳，……翌日亲登嵩高，御史乘属，在庙旁吏卒咸闻呼万岁者三，登礼罔不答。”呼万岁者三，是谁呼的？苟悦注曰：“万岁，山神称之也。”十五年后，即大始三年二月，汉武帝又称自己“幸琅邪，礼日成山。登之罘，浮大海。山称万岁”。自此，“万岁”成为皇帝的专用称呼。除皇帝外，任何人都不得自称“万岁”。

“六经皆史”，是说《易》、《书》、《诗》、《礼》、《乐》、《春秋》六经都属于中国古代史书，这是中国传统史学中适应封建社会后期史学思潮，以持世救偏的姿态出现的重要治学理念。“六经皆史”学说，历朝历代均有学者大力提倡。隋朝的王通曾说：“昔圣人述史三焉。其述《书》也，帝王之制备矣，故索然而皆获；其述《诗》也，兴衰之由显，故究焉而皆得；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迹明，故考焉而皆当。此三者，同出于史，而不可杂也，故圣人分焉。”以后，又有宋朝的陈傅良、元朝的郝经、明朝的宋濂、王守仁、王世贞等人相继展开论述。其中王世贞的论述较为详细，他在《艺苑卮言》中提出：“天地间无非史而已。三皇之世，若泯若没；五帝之世，若存若亡。噫！史其可以已耶？六经，史之言理者也。”王世贞还将六

经的各文体进行了具体区分，认为它们有的是“史之正文”，有的是“史之变文”，有的是“史之用”，有的是“史之实”，有的是“史之华”。清朝的袁枚在《随园随笔》中也提出“六经自有

史”的见解。清代史学家章学诚是将这一命题深入阐发和系统整理的集大成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内篇·易教上》中提出：“六经皆史也。”他认为六经乃夏、商、周典章政教的历史记录，并非圣人为垂教立言而作。在此基础上，思想家们进而提出了“六经皆史”、“六经皆器”等命题，以反对“离器言道”。

何谓
『六经皆史』



城东早春

◎ (唐)杨巨源

诗家清景在新春，绿柳才黄半未匀。
若待上林花似锦，出门俱是看花人。

【赏析】

这首诗写诗人对早春景色的热爱。题中的“城”指唐代京城长安。作者曾任太常博士、礼部员外郎、国子司业等职，此诗约为在京任职期间所作。

上联可结合诗题来理解。首句是诗人在城东游赏时对所见早春景色的赞美。意思是说，为诗家所喜爱的清新景色，正在这早春之中；也就是说，这清新的早春景色，最能激发诗家的诗情。“新春”就是早春。“诗家”是诗人的统称，并不仅指作者自己。一个“清”字很值得玩味。这里不仅指早春景色本身的清新可喜，也兼指这种景色刚刚开始显露出来，还没引起人们的注意，所以环境也很清幽。

第二句紧接首句，是对早春景色的具体描写。早春时，柳叶新萌，其色嫩黄，称为“柳眼”。“才”字“半”字，都是暗示“早”。如果只笼统地写柳叶初生，虽也是写“早春”，但总觉得淡而无味。诗人抓住了“半未匀”这种境界，使人

仿佛见到绿枝上刚刚露出的几颗嫩黄的柳眼，那么清新悦人。这不仅突出了“早”字，而且把早春之柳的风姿写得十分逼真。生动的笔触蕴含着作者多少欢悦和赞美之情。早春时节，天气寒冷，百花尚未绽开，唯柳枝新叶，冲寒而出，最富有生机，最早为人们带来春天的消息。写新柳，正是抓住了早春景色的特征。

下联用“若待”两字一转，改从对面着笔，用芳春的秾丽景色，来反衬早春的“清景”。“上林”即上林苑，故址在今陕西西安市西，建于秦代，汉武帝时加以扩充，为汉宫苑。诗中用来代指京城长安。繁花似锦，写景色的秾艳已极；游人如云，写环境之喧嚷若市。然而这种景色人人尽知，已无新鲜之感。此与上联，正好形成鲜明的对照，更加反衬出作者对早春清新之景的喜爱。

此诗纳清极、秾极之景于一篇，格调极轻快。诗篇特从“诗家”的眼光来写，又寓有理趣，也可以把它看作一种创作见解：即诗人必须感觉敏锐，努力发现新的东西，写出新的境界，不能人云亦云，老是重复那些已经熟滥的旧套。